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380
29 Jul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届大会
2000年2月12至19日
泰国，曼谷

贸发会议秘书长提交第十届贸发大会的报告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比市场统一看得更远：全球社会为安全和发展 进行合作，分享知识 个人的一些看法 贸发会议秘书长 鲁本斯·里库佩罗	
导 言.....	1 - 12
一、全球化和发展：当前僵局的起因.....	13 - 65
A. 外债环境的缺点	16 - 34
1. 金融自由化、私人资金流动和发展程序的 不稳定	16 - 20
2. 发展资金不足和债务问题.....	21 - 29
3. 发展和国际贸易制度.....	30 - 34
B. 发展中国家内部所受的限制	35 - 65
1. 结构上的特点.....	36 - 44
2. 知识、技能和企业	45 - 55
3.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发展模式	56 - 65
二、迈向国际对增长和发展新的承诺：改善全球化世界 经济的管理	66 - 94
A. 对高度、稳定增长作出承诺	67 - 69
B. 便利国际贸易、金融和知识	70 - 94
1. 贸易制度：使市场便利发展	71 - 77
2. 发展的资金结构	78 - 86
3. 为发展逐步加强知识的管理	87 - 94
三、贸发会议：一个为发展事业服务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	95 - 142
A. 中心问题领域.....	100 - 104
B. 了解全球化、依存和发展的相互作用	105 - 110

目 录(续)

<u>章 次</u>	<u>段 次</u>
C. 贸易和发展.....	111 - 129
1.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正面议程	116 - 122
2. 商品的重要性	123 - 125
3. 服务和电子商务	126 - 127
4. 贸易效率	128 - 129
D. 投资和发展.....	130 - 139
1. 研究和政策分析....	133 - 134
2. 能力的培养.....	135 - 136
3. 鼓励看法的一致	137 - 139
E.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	140 - 142
四、伙伴关系和效率：增进贸发会议对发展的影响	143 - 190
A. 技术合作.....	147 - 161
1. 经常方案和预算外方案的连贯性： 确立优先次序的挑战	148 - 153
2. 经常方案和预算外方案的连贯性：资源管理	154 - 157
3. 成员国的作用.....	158 - 161
B. 贸发会议和其他国际组织.....	162 - 168
1. 协调：目标.....	163 - 165
2. 贸发会议和其他面向发展的组织：与分工 有关的问题	166 - 168
C. 贸发会议、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	169 - 179
1. 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171 - 174
2. 让民间团体参加贸发会议的辩论	175 - 179
D. 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贸发会议：总结评论	180 - 190

比市场统一看得更远：全球社会为安全 和发展进行合作，分享知识

个人的一些看法

贸发会议秘书长 鲁本斯·里库佩罗

这个世纪，事实上是这千年，是在阵阵粮食恐慌、经济风暴再加上战争中结束的，这似乎有点不公平。与诗人预言相反，我们的世界是以一声爆炸、而非一声叹惜结束。

战争、危机和粮食恐慌有着共同的效应：都带来恐惧、焦虑、不安。我们不一定真正受苦，只是感到一种威胁，有可能对未来失去希望。我们不能只生存在今天，更要为明天而活，不断地计划以后要做些什么。一个对未来没有任何憧憬的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做人有两点需要最基本，就是：安全的需要和感情的需要。今后如果不能满足这两点，那么，做人也就失去其意义。

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之所以成立，最初都是为了一个中心目的，就是提供安全。现在，这个世界出现了大变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是否照样能保证安全呢？

数年前，对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外部侵略、国与国间的战争。由于一系列的因素，一方面靠运气，另一方面也靠联合国这样国际组织所作的努力，人类侥幸地逃过了“相互确保的毁灭”(MAD)。现在，冷战、“恐怖平衡”、世界被分成两个集团、欧洲、德国、柏林、越南被分成两半、意识形态对垒和极权共产主义，都已成为过去，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应当为之感激。

但是，我们刚刚避过了核毁灭的威胁，马上又碰到另一种极野蛮的破坏和暴虐，就是：在柬埔寨、非洲、波斯尼亚、又在科索沃爆发的内战、族裔清洗、种族灭绝。不论是联合国也好、区域组织也好、北约那样的军事联盟也好，原来的目的都不是要应付此起彼伏的国内战争。怪不得它们既不能预防这种冲突的爆发，爆发后也不能很好地处理。

科索沃战争出现了一种可叹的怪现象。平民不但死伤，而且死伤得最多。几乎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平民是唯一的牺牲者。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对着目

前情况感到迷惑、彷徨。简而言之，我们越来越难知道哪些价值值得肯定，哪些价值需要否定。我们作的选择往往是得此失彼，以同样轻重的价值拿来交换。

在北约国家里，对科索沃有争议的不是作战的目的——因为谁都承认，对族裔清洗不能袖手旁观——而是作战手段。如果说，本国士兵的生命是神圣的，那么，难道外国平民的生命就不同样地宝贵吗？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难道不能由联合国来管、一定要拿到联合国构架以外去处理吗？为在科索沃进行干预拿出了种种理由，若在别的国家、在欧洲范畴以外、在电视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出现类似情况，这些理由也同样地适用吗？

提出问题，不是怀疑最近所作的决定，只不过指出：即使在参与科索沃战役的国家里，抉择余地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善的、选择性的。这样提出问题也不是要为不行动和瘫痪找借口。在象科索沃那样的极端情况下，人，仍是首先需要照顾的对象。卢旺达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据估计有 100 万人被杀，而令世界视若无睹。

只要我们追寻某些价值是靠牺牲其他价值，事实就会摆在我们面前，一旦被迫行动，必然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免不了一场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大家搞得更糊涂，正是当前迷惑不安所在。

技术——也就是实用知识——似乎已近于实现人最古老的梦想：刀枪不入，我有能力打人而不被人打。本来，这样的发展应该是好事，结果却半真半幻地造成了战争代价和利益的不平衡，使胜利一方不需要作出多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显然变成了权势的后盾。但是，也有些国家没有技术，碰到这样的新发展，它们又怎么看待安全问题呢？要让它们不会感到更不安全，最好保证莫过于将新突破的作战手段用来加强、而非践踏集体安全概念。也就是说，新式作战手段应用来为国际安全和国际法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设立一个更好的决策机制，既不出现冷战时的瘫痪，也不会在碰到道义受侵犯时顾此不顾彼，要么牺牲某些价值去大力行动，要么为了保护某些价值而不行动。

只有这样民主、有效的机制，才能一方面赢得有力行动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为大多数人所衷心拥护，一反当前迷惑，无异议地将权力加以合法化，使人们的期望和价值观趋于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没有联合国。联合国是国际制度里的道义所在，是唯一真正全人类的论坛。只有在联合国里才能实现这种不可或缺的协调一致。

人同环境同样地反映了技术知识制造权力的因和果。原来以为人定胜天，结果正相反，战胜自然带来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安全感。两世纪的工业扩张解放了一股力量，制造了前所未见的财富，使生活越来越舒适。但是，今天这股力量竟威胁到大气层、气候、海洋、森林，最近还威胁到生命本身的秘密。

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写《二十世纪大恐慌》，所想到的只是核毁灭。到今天，令人们恐慌的却是切尔诺贝利式的核意外、石油溢漏、海洋中毒、臭氧层破坏、地球温度上升、森林被乱砍伐、生物物种消灭等等。我们过去以为科技代表进步，现在发现这种信仰过于天真。越来越看得清楚，当今许多问题——象“疯牛症”、大西洋两岸关于打荷尔蒙养肥牛肉的争论、对基因改造食物的畏惧、艾滋病的无救药等——要么指称由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直接负责，要么想他们同大企业狼狈为奸，故不敢预先防止。

这些问题似乎单独存在，之所以把它们连起来。是因为无论发展中国家、抑或在发达国家，都有许多有思想的人为此感到一种莫名的、但非常实在的恐惧，觉得有一股势力——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庞大的跨国公司、关起门来开会的国际组织——正在控制着他们的生命，不受任何人管，不对任何人负责。人们有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知道有些人希望弥补人类同自然之间的裂缝，甚至对这些人的关注感到同情，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作出一些棘手选择。为了拯救一个因有些国家生产过度、消费过度而危害的地球环境，是否应从此停止经济增长，不允许其他落后的、贫穷的国家发展呢？是否应本于预防性原则而放弃用基因工程治病、靠基因工程改造农业的希望呢？

若把眼光放在经济上，这也同其他领域一样，到处涌现不安全的现象。在世纪结束之际，我们并没有能解决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大规模失业，一是贫富日益悬殊。至今还没有任何制度能很好地安排生产，为每个愿意工作的男女提供一份有用的职业。在国家内和国与国间，贫富不均、收入不均是越来越明显。雷蒙·贝克和珍妮弗·诺丁最近作了一份研究报告，声称：“若非目前、至迟到下世纪初，最富和最穷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 150 比 1。”¹ 一个工业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趋向已被扭转，终生就业已不能得到保证。一位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代表

最近指出，我们的世界本末倒置：许多成年人没有工作，要回学校学如何“再就业”，而许多应当上学的儿童却被迫去工作。

世界上，贫穷地方占了地球很大部分的面积。由于亚洲两年前出现经济危机，发展之是否能持续已成疑问。这是过去二十年间出现的第五次严重货币和金融危机。主要为了三个原因，它值得被称为一场“发展危机”。一、它冲击的对象几乎全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国的经济不但没被波及，甚至由于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回流、货币贬值而造成的便宜制成品进口，反而受益。二、很奇怪，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使人严重怀疑是否真如长期以来所假设，一个国家发展之后，它的经济就比较不易受到外来震荡。三、人们不能不怀疑，即使危机消逝，数十年来不停发展的所谓“亚洲之虎”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繁荣。

在受冲击的国家里，千百万人失去了工作。三十年来为消灭贫穷取得的进展断送于数周之内。焦虑、绝望、不安全、甚至在有些国家政治解体和暴力，纷纷重新出现。1998 和 1999 年间，富国经济增长许多年来第一次显著高于穷国，使贫富之间差距再次扩大。

在国家的经济里，就象在政治和环境安全领域一样，人们可以看到，凡是能掌权、掌知识，这些经济受危机影响程度就轻得多。在 1990 年代初期，英国和意大利的货币都曾贬值，却不象 1997 年的泰国或南朝鲜，没有随之而出现金融崩溃，令投资者恐慌乱窜。这是否因为该两欧洲工业国拥有较强经济实力、较好“基本条件”、更多知识技能、有能力管制和监督金融市场呢？

经济决策和人的因素也与其他实际选择一样，顾此而不能顾彼。我们是否应牺牲就业安全、要人们接受朝不保夕作为“正常”的条件、以此换来劳力市场的灵活性、以期最终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为达到此目的，是否有必要把劳工费用尽量压低、制造更大批“有职业的穷人”、导致更多贫困、更极端的不平等呢？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否永远要在金融风浪中，随波而逐呢？

贝克和诺丁一文写：“我们的世界已让低成本运输和通讯——特别是电视、流动电话和英特网——联系起来，穷富之间收入差距 150 比 1 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有 10 亿人生活极端贫困，另有 10 亿人过着富裕日子，而地球在缩小，成为一个整

¹ Raymond W. Baker 和 Jennifer Nordin, “A 150-to-1 Ratio is far too lopsided for

体，这悬殊如何能持久？……世界上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之间 150: 1 的比例，无论对富国、对穷国，都是极大的威胁。”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比多数人看过更多的人类悲剧。她在浩劫博物馆里曾语重心长地说：“只要种族灭绝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化”。

她的意义很明白：一、不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或自然环境安全，都相互联系，不能划分界限；二、全球化不可能只规限于经济领域。

五十多年前，罗斯福总统说过，凡人都应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免除贫困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基本人权——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发展权利——是相互结合的。

有些基本价值观现已普遍化，需要我们大家，无论穷、富，都分担责任。人权如此，全球环境也如此。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些领域把担子都放在穷人肩上，不要求富人也以团结精神去消灭贫穷、实现发展呢？官方发展援助在大幅度地减少，这是极不合理的，反映了值得令人深为忧虑的新趋向，侵蚀着全人类的道义基础。其实，道义只有一个基础：就是人的团结。这个信念不能只是口头讲，还应用行动来表达。

绪方贞子说，全球化不能与种族灭绝共存，意思不过是：全球化，要名符其实，就必须包括人、不能排除人，要容纳人、不能使人边缘化，要设法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不能普遍地带来贫穷和死亡。

绪方贞子说的话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我们强调。她说——而且我也同意——全球化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历史产物，不是外界力量强加于我们的一个既成事实，不象天上的星球一样非我们所能控制。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在建造中的工程”，是一出我们还没有看完的戏。在这戏里，我们又是台上的演员，又是戏中人物。全球化只是在初期阶段，好戏还在后面。柏林墙倒也不过是十年前的事。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政治和社会大地震，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结束了意识形态的对垒，促成了今天全球化所特有的理论和价值观的合一。

斯蒂芬·康明斯²写：“有些著作以为，全球化已是一套已完成或快完成的关系和制度，其实，它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出现的东西，这种过渡至少要拖 15、25 年。”

Comfort”，《国际先锋论坛报》，1999 年 2 月 5 日，社论、舆论篇。

² Stephen Commins, “Globalization and Foundations for Human Security”, 《世界观》论文，世界观国际，第 8 期，1999 年春季，第 20-28 页。

有些新的关系非但不会巩固安全，反而可能破坏安全。全球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往往把全球化讲得太简单，忽略了不同社会的含义和微妙的差异。康明斯又写：“一个较完整的构架需要看到人口和环境问题、新典型的妇女、新形式的暴力和冲突。一个狭隘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概念，往往看不到许多深刻的缺点。”康明斯说，“现在我们处于转变的早期，这意味着我们面前有一段空白的时刻，如果抓紧它，能形成新的政策，建立新全球机制，这是今后 10 年或 15 年难得的机会。”凡是有良心的人、有希望的人、有能力有勇气的人，不分男女，都应伸出双手抓住这机会。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应付这许多深刻的变化是一场不容易的挑战，但方向并非不明确。与其去适应这个号称不可改变的全球制度，发展中国家应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配合自己的步伐，照顾到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努力设法去拟造这个制度。当然，在这同时，它们还需要有效地将自己纳入一个新的、更开放的经济制度。

对贸发会议来说，它的任务很清楚。它必须走得更远一点，设法去了解全球化，解释全球化。它必须发挥它的作用，保证世界不要为变化而变化，而是为进步而变化。贸发会议的任务不仅仅是让发展中国家同世界经济和贸易制度毫无保留地接轨。事实上，不象经常所说的那样，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不是它的程度和速度，而是它的质量。接得太快、太密切，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就拿我的国家——巴西——作例子。从 1530 到 1890 年，350 年间，巴西是完全纳入了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制度。那时，巴西生产的糖和咖啡几乎全部出口。外贸占了经济的很大比例。但是，这完全是因为巴西结合了农庄制和奴隶制，把土地所代表的财富和靠出口换来的收入都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奴隶则仅靠糊口生存)。

农庄和奴隶制之所以能兴起、并得以维持，是因为狼狈为奸地同外国市场建立了联系(而在美国北部各州里，由于生态条件不利，不能建立大规模的农庄生产出口产品，因此，奴隶制也就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当时巴西完全同世界市场接轨，结果社会只有退化，没有进步。一个分成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怎么可能内部团结呢？但也可以例举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不象巴西那样同国际结合，结果在殖民时代经济规模小得多，但是，社会则比较平衡。

但今天也不难认明一些国家，过份地依靠外国资金，过份地依靠少数几样商品，把外国直接投资不成比例地集中于“经济特区”里。

总而言之，我们应设法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一个较能满足它们需要的全球制度里，帮助它们稳步、协调地增长，不断提高国内储蓄和生产力，将供应能力加以多样化，获取更多的增值环节和技术。

毫无疑问，某种新的秩序正在形成，它的轮廓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在有些情况下，它显然已走上岔道，造成了不平均、不稳定、不安全，减少了国家和政府的灵活性和行动能力。我们不应很被动地接受这种发展，而应设法将之纠正，以避免变化带来混乱或不平。联合国过去的几次大型会议和其他论坛都提出过要建立一个较公平的国际秩序。现在方法是改了，时代也变了，但是，这任务并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下去。

卡斯提尔王“智者”阿方索说过，如果他能看到宇宙的创始，他会提一些意见，把宇宙造得更好。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态度，只不过不象他那样大言不惭而已。

国际制度在变化，那么，问题就不是它是否能变，而是朝什么方向变，变的结果有什么意义、性质如何。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到底希望生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我想在这里试图作一个答案，就是，真正的全球化远不止于仅仅降低壁垒、统一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它也不能只是自由化，虽然它往往靠自由化作为政策工具。

值得指出，直至最近，全球自由化的做法是有选择性的。有些国家受到压力将贸易、投资和金融加以自由化。但是，一旦谈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谈到劳动力的流动，谈到移民或知识的不受限制传播，有些人对自由化就没有那么热心了。

真正的全球化应设法统一人民间和文化间的通讯、交流和合作。这里讲的不是抽象的交流而是通过人把这些概念变为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突出现代化的意义，挖掘现代化的潜能，在电信和电子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改变我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这样的全球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人同人多接触，打破孤立，使对话、交流、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来往更容易、更迅速、更便宜。更好地利用电子通信，并不意味着只是便利货物的交易，还意味着汇通看法、价值观、信仰和感情。电子通信应鼓励对话，而不是要搞文化上的冲突。现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人通过英特网被联系起来，这就是对话最好的表现。

推动全球的技术程序、以越来越便宜的价格瞬息间传播大量的信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同古腾堡的印刷发明相比拟，不愧称为第一场“信息革命”。

正由于这技术的影响，市场取得了今天的首要地位。因为尽管市场不完善，还是远远胜于官僚机构，能通过价格机制处理大量的信息。固然，市场不一定能带来安全，争取人权，改善环境的质量，消灭贫穷，越过冷酷的统计数字和价格实现平等和道义。但是，市场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信息时代，更好利用信息就是知识。在市场上，这已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信息是一种战略工具，能缩短距离、提高能力，甚至于比资本、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更为重要。

知识在这方面分两类。一类是技术和经济知识，使人能够控制产生货物和服务的复杂程序，以赚钱的方式销售这些货物和劳务。另一类知识则没有那么实在，包含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知识，使人们有能力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制度，使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得以协调配合。

在讨论今天知识密集的经济的时候，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第一类知识。但是，当知识变成决定因素、变成关键商品的时候，它也就能促进发展，使发展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学习进程。

对竞争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竞争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除了明确的规则、公平的裁判之外，还有第三点内容也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要作出充分的准备去学习如何竞争。要求一个小学生去同哈佛大学或巴黎大学的毕业生竞争，这是荒谬的。但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许多人正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这样做。

最起码，每个新手应有平等机会去学习竞争，有一段时间受训，才不至于一下子就被老手打垮。光是把球场铺平是不够的，因为国家和个人有穷有富，起步点都不一样。

如英国历史学家 R·H·托尼所写：“上升的机会不能取代收入和社会条件较大幅度的实际平等。要有机会上升，道途不仅需要开放，起步点也应当一致。这句话是罗依·哈特斯利在《新政治家》杂志的一篇文章里³引用的。作者指出，130年前威廉·格拉德斯通已取缔了英国体制里对文官和武官任职的屏障，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官职还是归同样的少数人所有。

有些国家已认识到，“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贫穷线下的家庭，不论绝对或相对而言，都是一直贫穷下去”。所以，国家不得不采取正面行动，制定平等机会法和

其他积极措施，以纠正起步点的大幅度差异。我要说的是，发展中国家也同穷人一样，需要不断地得到“特别和分别待遇”。这种待遇今天需要重新制订，比以往更配合现实。

围绕着这问题辩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知识和权势的相互作用。知识能产生权势，反过来，权势也能巩固知识。正如培根 400 年前就说过，“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这就说明，政治和经济势力为什么要保护知识。这个趋向通过最近的多边谈判得到显著地加强。

谁都不否认，发明者和创新者应得到适当的报酬。但是，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朝这个方向是否已走得太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知名商业史家约翰·加兰布斯教授曾确凿地声称：⁴ “全球垄断就如日出，不可避免”。事实上，药物制造的卡特尔正在形成，软件工业和英特网已占有了统治地位，连主要工业国的竞争当局都无法旁观，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是，竞争法和竞争机构，即使有、也非常软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能得到什么保护呢？

以为只要多建学校、或在教室里设置电脑，就能解决知识的问题，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现在，贸易和其他壁垒已相继崩溃，我们还需要保证不会有新的、不合理的壁垒出现于数据银行、生物体的基因改造等领域。一万二千多年前，农业在中东发明。自从那时起，种子和牲畜一直自由地从一国传到另一国，从一个文化传到另一个文化，成为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览所谓的“变的种子”。

这些变的种子——象玉米、土豆、西红柿、可可等——往往取自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埃利奥特的诗句发人深思：

有的财富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有的财富是我们夺来的战利品⁵

³ Roy Hattersley, “Meritocracy doesn’t work”, 《新政治家论文》: “Up and down the social ladder”, 1999 年。

⁴ 引自 G. Pascal Zachary, “Let’s Play Oligopoly! It’s a Favorite Pursuit of Corporate Giants”, 《华尔街日报》文, 1990 年 3 月 10 日, 第 1 页。

⁵ T.S. Eliot, “Little Gidding”, 《四部曲》第三部分, 《1909 至 1950 年诗剧全集》, Harcourt, Brace World 出版社, 纽约, 1971 年, 第 143 页。

一个民族自愿地对其他民族作出了贡献，往往就偿还了所欠其他民族的债。这是对人类共同财富有供、有取的一种平衡。现在，我们是否应当往相反的方向走，为了盈利让所有东西都归私人拥有，这是否明智呢？

过去，知识往往是统治和压迫的一个因素。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兴起，统治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人民。“历史是奴役，历史也是自由”。⁶ 但是，如要历史不重复，那么，明天的历史就只能是自由的历史，知识也不能成为专利、而要当作一种解放的力量让大家都能享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控制论创史者诺伯特·威纳的愿望：“有了信息，就有了自由”。

如果正当电子通讯革命使大量信息能在文化间流动、大大地提高人类智力的时刻，我们反而把知识封闭，不让人享用，这真是一种乖张的做法，难以自圆其说。

目前所最迫切需要，正是种能管理日益复杂社会制度的知识。有了这种知识，社会才能协调、才能有意义。可惜，这方面的知识最为缺乏，进步最不全面，因为它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要靠经验去吸取，慢慢地成熟。用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沿着现实趋势而逐步演变的过程，是一种长时期的探索，绝非短期或中期获取的简单知识所能比拟。一个先进社会，不但学会了如何致富，还能在政治经济上成为稳定、民主，少受暴力的威胁，变得更平衡、更团结、更协调。看到这样的社会，我们就能深刻体会到这种知识的含义。这样的知识是全方位的，相互推动，在所有领域都能进展，不仅仅实现于经济效益，不仅仅是零散部分的总和。

这样成功的例子在国家方面比在国际方面容易看到，因为越走向国际，情况越复杂。不错，国际上的成就也有一些。在过去 50 多年间，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避免了原子弹的使用，这都是我们需要感激的事情。但是，也有不少工作还没开始。

贸发会议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它管的是世界经济的大方向，多看树林少看树。从发展的角度，有些话显然只有贸发会议有资格讲：例如，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必要把世界经济制度搞得协调一点。亚洲出现危机之后，货币和金融制

⁶ 同上，第 142 页。

度崩溃，严重地打乱了贸易。于是，在短短的这一时刻，国际社会重新注意到，货币金融和贸易之间确实不能没有一定的协调。

以前，大家都以为，最近几年来贸易大幅度地增长，到了世纪末一定会把全世界的经济搞上去。事实正相反。金融崩溃之后，贸易也就几乎全面停顿增长。1997年全球贸易增长10%，到1998年，才勉强增长3.7%。这样的急剧下降以最可怕的方式调整了国际收支。因为它不是靠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来导致进口增长，而是通过削减进口，恶性循环地把商品价格压下去，逼得出口不得不放慢步伐。

制度的不协调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比如，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不难一笔勾销了国与国间通过多年关税谈判所小心谨慎取得的贸易平衡。

可惜的是，一旦对全球危机的畏惧消逝，人们又会回到那换汤不换药的做法，重新搬出那些老话，说什么靠汇率的自由波动最终自然会使制度稳定下来。其实，采取了这套政策之后，30多年来，制度非但没有稳定，反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破坏性强。

在国际经济里，不仅仅是货币、金融和贸易方面缺乏协调。经济调整方案同社会、环境目标也不协调，使社会消灭不了贫穷，提供不了基本教育和保健，不能为失业者建立安全网络，也没钱去保护热带森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就是这种不协调的一个显著例子。坦桑尼亚用来偿还债务的钱要比它的保健开支高出九倍(尽管国内艾滋病蔓延)，比基本教育开支高出四倍。为了还债，坦桑尼亚不得不牺牲了它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资。

换言之，协调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财富。有了协调，人才能生活得有意义、团结、充实。而没有协调，则象埃利奥特《石头》诗中的唱词所叹：

发明，试验，再发明，再试验，
让人知道动，而不知道静，
知道说话，而不知道沉默，
知道语言，而不知道真言。
我们有了知识，却更无知，
在无知中走向死亡，
但走向死亡却不走向天主……
难道活着就是要失去生命？

难道有知识就不能有智慧？

得到信息，反而失去真理？^{7 8}

第二千年纪元已到了尾声。埃利奥特可怕的预言是：

天已运行二十世纪，

我们却离天越远，离尘土越近⁹

要想逃避这可怕的预言，我们就有必要回到纪元的开端。最起码，要保证人能安全地享受到生命的所有层次。

光有安全还不够。人不能光靠安全或稳定生活。安全和稳定只不过是让人有可能迈向未来。我们的理想是：明天要比昨天好，要比今天好。我们要免除后代和后后代的恐惧、贫困，不能安全，还能创造、生产、工作，通过爱、温暖、团结、合作而能生活得更为美满。这种对未来的憧憬就是人的希望。

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有必要建立较灵活的结构以从事对话，作出决策，采取行动，最终让人们能够有比较现实的希望。换言之，必须为人类铺一条良性循环的道途。这是但丁《神曲》里尤利西斯鼓励战友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唯一真正值得人类追求的理想：

Considerate la vostra semenza:

Fatti non foste a viver come bruti

Ma per seguir virtute e conoscenza

天生你们是人的种子，

不是要做牛做马，

而是要追求道义和知识。

(但丁，《神曲：地狱》，第 26 篇章，第 118、119、120 行)。

* * * * *

⁷ T.S. Eliot, “The Rock” Choruses, 《埃利奥特诗剧全集》，第 96 页。

⁸ 同上。

⁹ 同上。

导 言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第九届贸发大会的时候正当全球化似乎在人类的眼前闪烁着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曙光。那时候的希望是千千万万男女老幼走的路越来越宽，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前途日益光明。那时候以为，只要发展中国家逐渐地配合世界经济的蓬勃增长，这样的前景必然会发生，而增长，又是全球化、自由化、迅速技术变化的必然结果。

2. 可惜的是，象汉姆雷德所说的那样，天地间有许多事情是分析家、决策者以及国际谈判者的哲学所梦想不到的。不错，在第九届贸发大会之前十来年间不是没有进步。在世界上约八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里人均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反过来，有双倍更多的国家仍然是极端穷困，贫富非常不均。而且，即使是取得的进步也十分脆弱。

3. 1996 年之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进展被扭转。全球金融不稳定使发展日益困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混乱。整个发展中世界已谈不上增长。1998 年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国内增长总值只上升了 1.8%。如果不算中国，那么，增长只达 0.8%。1999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2.0%和 1.2%。

4. 受冲击最大的正是那些似乎同全球化世界经济结合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国家里，经济危机已迅速地演变成社会危机、甚至是人的危机。在很大部分人口中，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穷人越来越多，保健和教育制度败坏，千万儿童辍学。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据估计，该国穷人 1997 年占人口 11%，到 1998 年已剧增至 40%，此外，迹象表明，有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逼得人不得不过分地砍树和捕鱼，造成环境的退化。

5. 固然，许多这些国家的危机可归咎于国内管理不当。但是，一旦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开放，碰到困难即易失控，这也是重要的因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立即从一系列的东亚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外流、外逃。1995 年至 1996 年间阿根廷和墨西哥两国共流失了 350 亿美元的短期资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大韩民国仅 1997 年即共流失了 240 亿美元的短期资金。国际资本市场的行为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过去一年间，资本市场对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借贷减少过半，而这种新借贷的利率都高于以往。对许多国家、包括若干非洲国家来说，资本外流和新借贷的大幅度减少已造成大规模的净资本往外转移。国际市场也同样地受到冲击。1996 至

1998 年间，非石油初级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降，至 1998 年更为加剧。石油价格在 1997 和 1998 年间都显著下降，到 1999 年上半年则略有回升。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有些制成品的价格最近也出现疲弱。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1998 年出口量增加并不能弥补出口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出口总值是减少了。

6. 在过去十年间，世界贸易确实迅速扩张。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增长远远落于进口增长后面。拉美国家特别如此，进口增长和出口增长的差额平均达 4%。这种不平衡是普遍的，唯一例外是中国。这情况的导因相当复杂。但如《199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所示，贸易条件恶化、出口购买力减少、贸易和资本帐户的全盘自由化对之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工业国增长缓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7.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趋向的后果是：1990 年代平均贸易逆差要比 1970 年代高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3%，年平均增长率则削减 2%。

8. 但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有困难应付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危机的正面冲击，而且，有些情况——例如，商品价格的下跌——对它们甚至是有利的，但是，除了北美之外，发达国家一般并没有能很好地利用全球化来带动迅速、持久的增长。此外，几乎在所有国家里，自由化和全球化都使收入对比进一步恶化。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遇到困难，使这种趋向变本加剧。据估计，到了 1990 年中期，这些地区每 3 个人里便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每日仅靠 4 美元过活。

9. 总的来说，希望靠加速增长、扩大就业机会、减轻贫困而为社会造福的预测，看来确实是过分乐观。国内的日益不平等反映了 90 年代国与国间的两极分化。最富的 20% 人口所占的收入比例几乎普遍地上升，而且往往是扭转了战后的趋势。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收入的日益不稳定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价格稳定，财经纪律加强。

10. 怎么会这样？学者在今后若干年里大概会一直寻求答案，能不能解答倒不清楚。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管制自由化和全球化、使之成为全人类造福，绝不象以前所想象那么轻而易举。过去的假设是，只要市场不受约束，一旦发动全球的金融和工业能力，就必能创造条件，使所有国家、所有社会群体受益。这样的假设忽略了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事实，就是：自由化和全球化双管齐下已造成了一种崭新的局面，在经济上要成功首先就需要迅速地获取技能，通过市场创造和有效地利

用技术和信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自由化和全球化实际上使高技能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的选择加速增长，扩大了它们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机遇上的差距，同时所有国家里，也扩大了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差距，让前者有更多可能扩大他们的收入，生活得更舒服。

11. 在许多国家里，这样的趋势使人们对目前的经济战略越来越不满，威胁到政府维持一个开放和自由制度的能力，而这种开放、自由的制度正是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有不少迹象说明，这正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

12. 因此，我们极有必要重新考虑作为世界经济运行基础的程序、机制和政策，特别是重新认识发展中国家同全球化动力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样重新考虑是及时的，也是可行的，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种演变中的程序，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化。重新审查的目的是要使这些进程内在的相互协调。例如，失业率增加、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收入差距扩大，这种日益明显的现象到底是否为全球化进程所固有？更重要的是，必须设法使全球化进程公平一点。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制度如果不能使穷国、穷国里的穷人有充分和现实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话，最终必然会失去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的信心。而一旦失去这种信心，任何世界性的经济制度也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

第一章

全球化和发展：当前僵局的起因

13. 国际贸易、国际资金流动、直接外国投资和私营企业之间其他形式的跨国联系是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反过来，全球化又创造了新的条件，导致这些流动和联系进一步地扩展。目前，金融交易是外汇市场上最大宗的交易，在比例上远远大过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不如其他金融交易增长得快，但仍然快于普通外贸的增长。而即使外贸本身也一直也增长快于全球的产出。跨国联系之所以越来越密切，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制度的迅速自由化，利用信息技术的进展作为传递工具。因此，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务仍然是在当地生产，在国内消费，但是，全球化传递机制的活跃促成了一种广大的宏观趋向，从本质上来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发展环境。

14. 全球化导致了发展的多方面不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和发展更是分道扬镳。第一种不平衡，是管制发展、贸易和资金的国际制度结构上的不平衡。日益明显，在许多方面，这种国际制度的结构在发展中国家的道途上设置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使它们无法受益于全球化的潮流。实际上，全球化并不全面。例如，在劳动力的流动、企业的责任等方面往往不能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制度中的不平等，反映了这问题的不受人注意。

15. 第二种不平衡是，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贫富悬殊，发展和落后并存，生产结构和相对优势仍然属于不发展典型。极端贫困的一个方面是严重缺乏技能，特别是没有能力应付知识、技术和信息流动格局的迅速变化，没有能力掌握新涌现的金融工具和做法。由于这种技能上的不足，发展中国家一般不能象其他国家那样，自由地利用国际制度，要作选择也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它们不能灵活地掌握变化，一旦碰到新的需求、价格和其他竞争性条件，也就更易受到冲击。

A. 外债环境的缺点

1. 金融自由化、私人资金流动和发展程序的不稳定

16. 东南亚发生了财经危机，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使其中一些受到严重打击。这场危机是国际资金市场全球化、金融和资本市场过度自由化所产生的，财政管制没有同时加强，更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1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工作组编写了一份报告，题为“迈向新的国际财政建设”(ECESA/99/1, 纽约, 1999年1月21日), 发人深思地讨论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国际因素。报告指出, 金融市场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 一下子膨胀, 一下子收缩。有时, 资金拼命往借方外流动, 不顾风险, 然后, 资金又从借方收回, 那时, 风险就被过分地夸大。金融界全球化之后, 利用通讯迅速, 可取得大量的信息, 在很短的时间内有能力将大笔的资金跨国界移动, 把这种时涨时衰的周期带入了国际场合。因此, 近年来, 通过这些市场国与国之间的资金流动变得极不稳定。

18. 过去若干年间,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金融危机是有感染性的。一旦出现困难, 市场并不能很好地分辨哪些国家底子强, 哪些国家底子弱, 哪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好, 有能力进行宏观管理, 哪些国家没有这种能力。此外, 一旦投资者在一个市场上亏损, 为了弥补损失, 往往就不得不抛售他们在别国的资产, 使价格连锁性地疲弱, 将金融危机从一国带到另一国。

19. 发展中国家和转变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易受金融动荡的打击和感染。有些时候, 各种各样的国际资金迅速流入这些国家, 有些时候又突然返转, 对这些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一旦出现扭转, 国内银行制度受到破坏, 为了应付危机不得不采取一些政策, 通常导致产出和贸易的下降, 对贸易值和贸易量都造成压力。这样, 金融的不稳定就因贸易的不稳定而变本加剧, 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恶化。产出削减导致工资、收入和就业普遍下降, 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事实上, 过去十年间已看得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都会受到影响。资金大规模流入的时候穷人不一定能得益, 可是, 资金外流的代价却往往要由穷人来承担。经验告诉我们, 即使金融市场宣布危机已过去, 社会所受的遗害仍然持续多年。

20. 最近的经验也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国际金融界日益复杂、日益活跃，投资方式多样化、全球化，但是，却没有适当的体制框架去管理它。现有的体制都不能很好地应付金融的全球化，拟定发展模式的时候也没有能考虑到这点。

2. 发展资金不足和债务问题

21. 在过去 20 年间，资本市场迅速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能直接向资金市场借贷，反而官方发展援助停滞不前，多边金融机构贷款的步伐也显著地放慢。但是，向私人资本市场借贷并不能真正地取代官方发展援助。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贷款一般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支助生产能力的提高。因此，通过多边金融机构的正常活动去扩大官方援助，仍然是极有必要的。任何有信誉的发展模式都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2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官方发展援助一直是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官方发展援助是国际社会声援发展事业、发达国家援助穷国最直接的表现。官方发展援助如何分配给受援国完全由捐助国来决定，能投向最贫困、最需要这种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此外，援助在每个受援国里的分配也是由捐助国和受援国政府联合控制，因此，也能直接投向受援国社会上最贫困的阶层。换言之，官方发展援助有潜能直接帮助最贫穷国家里的最贫困人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最贫困国家里最贫困人们对援助的需要，只有靠援助国政府同受援国政府密切配合、积极地、富有远见地作出行动才能满足。

23. 不幸的是，国际上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努力，绝对说不上是积极。自从 1992 年以来，对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按实值计算显著地减少，甚至按表面值计算也开始下降。1995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值基本上达到 600 亿美元，到 1997 年降至 490 亿美元。经合发组织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所占全体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每年越来越低，1990 年占捐助国国民生产总值 0.33%，到 1997 年降至 0.22%，还不及联合国所订这种流入额指标的三分之一。

24. 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官方发展援助尽管少了，至少能更多地集中投向较贫困国家。就象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一样，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也在下降。在 21 个经合发组织捐助国里，就 14 个来说，投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官

方发展援助在 1996 年低于 1990 年。总的来说，最不发达国家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里所占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33%降至 1997 年的 24%。

25. 很明显，官方发展援助没有能够发挥它的潜能。

26. 不仅如此，一系列的较贫困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一直承担着它们所无能力偿还的债务，使它们无法同债权国或捐助国恢复正常关系。例如，1998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还本付息方面的拖延率竟占总债务的 25%，使它们无法取得必要的发展资金，造成了援助方面的极大不平衡。

27. 许多较贫穷国家没有能力实现社会和经济进展，这是同它们债台高筑、问题重重分不开的。它们的债务负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费资源和出口收入。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认识得很清楚，过去的债务利率太高，偿还期太短，与债务国的还本付息能力不成比例。有些方面已采取了行动，首先是设法延长债务的偿还，如果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就勾销部分的债务。

28. 1996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负债最多的贫穷国家发起了一项特别减轻债务行动，目的是要将每个有资格国家的未偿还债务减至可承受的水平，也就是说，减至可还本付息、而不至于拖欠的水平。但是，对所谓负债最多贫穷国家的资格标准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必须经过几个阶段才允许减轻债务。这一切反映了这种行动的经费不足。许多组织——包括贸发会议在内——所作的分析都强调了这一点，许多非政府组织也为此作出了呼吁。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商品价格下跌，使问题更为急迫。

29. 因此，八国集团于 1999 年 6 月提出了新的指标，以更大的幅度、更快的速度设法减轻债务。这比起原来债务最重贫穷国家的构架有了显著的改进，有资格减债的至少加了 9 个国家，对所有国家的减债程序也缩短了。虽然八国集团已同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售 10,000,000 盎司的黄金，但是，各国间如何分担费用似乎还没有完全确定。

3. 发展和国际贸易制度

30. 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有规则的贸易制度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因为它缓和了经济和政治势力在制度成员之间贸易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但是，这些规则

本身、被拿出来谈判的贸易议题、以及在制度运行下出现的自由化格局，都不一定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3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贸易伙伴所关注的产品和部门不一样，对这些产品和部门的做法也各有异，这就说明了世贸的偏向。世贸对政府补贴科研和技术发展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让那些出得起钱的政府有自由提高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促进技术先进的出口。这方面的科研发展受到《与技术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保护，在这基础上让有关国家直接通过贸易或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市场。一般说来，其公司拥有最尖端技术的世贸成员国最方便利用这个制度保证市场对这些产品的技术开放，借此长期维持它们的竞争优势。

32. 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则得不到同样的待遇。商品——特别是食物和纤维——和它们的加工产品一直碰到进口国的高壁垒。发达国家的食品工业尤其受到高度保护，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很快地扩大它们的水果和蔬菜产品，对之进行多样化。对纺织品和成衣的关税也比较高。世界贸易组织的《纺织品和成衣协定》要求逐步撤除数量限制，但在执行方面允许相当长的过渡，使大多数的发展中出口国无法很快地得益。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成衣出口的数量限制一直要等到 2005 年才全部撤除。也就是说，一个世纪以前，纺织品和成衣部门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序的关键一步，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却享受不到同样的机会。

33. 这一切都直接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促进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能力。出口农业产品的能力直接同农村的收入和农业发展有关。成衣的制造业必然雇用了主要是低技能的劳动力，这部门的就业机会能直接促进减轻贫穷。成衣业的许多工人都是女工，她们的就业能直接提高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为此和其他一些原因，贸易制度不让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更顺利地进入市场，事实上是明显地限制了发展。

34. 贸易制度的其他一些因素也非有利于发展。这些因素包括：执行健康和卫生规定的方式，签发证书的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已打入市场的那些领域更多使用反倾销措施；对发达国家有利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很快地实现贸易自由化，反过来，对那些基本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劳务和劳动力密集货物的贸易则障碍重重，两者极不对称；还有，发展中国家在世贸里实现其权力也碰到许多困难。

B. 发展中国家内部所受的限制

35. 且不论贸易和金融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利，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得不尽量地设法利用这些制度。但是，发展中国家先天有一些缺点，使它们选择有限，无法靠这些制度去推动它们的发展。而且有了这些缺点，它们也无法充分地受益于现有的途径，保护自己，避免贸易和金融制度运行中所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

1. 结构上的特点

36.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许多其中最穷的国家，仍然高度地依靠商品来换取出口收入。在这些国家里，商品的生产通常占用了很大一部分国内的产出和劳动力。反过来，经费预算收入的一大部分往往也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商品的生产 and 出口。也就是说，商品的出口不仅仅是通过外汇收入、也通过这些其他的途径对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

37. 商品生产和贸易有一些特点，使之不能很好利用来从事发展。货物和劳务生产中商品所占的成份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在不断地下降，对商品的需求一般增长的远远慢于对其他产出的需求。不仅如此，对商品生产投资能改善生产效率，结果反而导致商品降价，便宜的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商品在世界贸易里所占的份额——无论是按数量、或按价值计算——都一直在不断地减少，在这种削减的趋势下面，出口收入是不可能稳定下来的。由于这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没有任何可靠的、强大的收入来源足以从事发展，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在世界贸易上所占的比重逐步减轻。这就是这些国家日益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8. 过去多年来，不少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去设法解决这种困难。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避免过分依靠少数几样商品，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要使生产和出口多样化。或者是设法出口更多种类的商品，或者是增加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有几个国家在商品部门本身、或通过农业企业，在多样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可是，也有不少国家反而更多地依靠商品。总的来说，在这方面没有多少改善，令人感到失望。

39. 商品出口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也受到多方的注意。一些国际设施，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商品稳定化贷款办法、稳定出口收入制度(STABEX)和稳定矿产品出口收

入制度(SYSMIN),都碰到了不少困难,使它们无法对收入的不稳定或其后果起到任何显著的作用。改善风险管理也是一个办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但是,这本身也有其限制。

40. 说到底,国家和国际都作出了努力去设法克服过分依靠商品的缺点,克服商品贸易在促进增长方面所受的限制,但至今还没有取得很显著的效果。

41. 从事贸易需要不少成本,也减少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所得的利润。不错,自由化趋势给予发展中国家不少新的贸易机会,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越来越复杂,贸易同投资、金融、运输和信息的流动都相互联系,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利用有效的、在国际上具有竞争能力的服务去支助出口,否则,市场上贸易壁垒的减少并不一定能使它们增加出口。

42.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运输费用也很高,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更尤其是其中的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一般来说,运费占发展中国家进口值的 8.1%,反过来只占发达国家进口值的 4.1%。至于内陆和岛屿最不发达国家,运费更高至进口值的 12%至 40%。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运输费用高是使他们难以进入国外市场的一个主要障碍。

43. 有些国家运费高,部分是由于地理所造成。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基本设施不足、设备维修不好、管制构架过时、信息流通缓慢、行政程序和结构过于复杂、运输计划不能相互配合、一般缺乏有关的技能等等,涉及不少具体的问题。内陆国家从事贸易需要通过别国,过境时受到许多规章制度的管制,这也是运费过高的原因之一。

44. 税关和贸易资金服务效率低也会阻碍贸易。有些适用于贸易和象多式联运等同贸易有关的交易的法律构架不够明确,可预见程度低,也是使发展中国家头痛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演变的贸易制度赢利的能力,需要作出全面结合的努力去解决。否则,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掌握日新月异贸易制度所提供的机会。

2. 知识、技能和企业

45.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不能充分地利用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的潜力,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们的劳动力没有技术。缺乏技术、缺乏基本教育、因此也缺乏获取技

术的能力，一向都是发展的困难所在。经济增长的现实和内容近年来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使发展在这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扩大了拥有适当经济技能和没有技能两者之间的差距。

46. 近年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增长和生产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现代化的制造业花好多钱从事研究和发展、产品设计、程序工程、质量控制、管理方法、经销、投资和适应变化的能力等等，正是反映了这点。技术在不断地变化，各种信息产生、传递、接受和利用的技术变化尤其快。互联网的扩展正反映了这个趋向，网上的信息流量每 100 天即翻一番，到 2000 年，140 多个国家里将有 2 亿的用户。这种基本变化便利将单一生产程序的不同活动分布在世界各地，然后通过跨国公司的业务将生产“深入地”结合起来。这样，不同投资来源的公司就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联系，建立伙伴关系，搞其他形式的合作。

47. 更重要的是，知识日益发挥关键作用，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部门的一种投入，对国家内部和国与国间的收入分配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自然有利于那些能够掌握知识的人，不利于那些不能掌握知识的人。工业国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若是以技术和技能为基础，即使经济在不断地扩展，大部分的人口反而会后退。国际上也遵守同样的规律：如果知识是经济成就的关键，那么在世界上，那些缺乏必要技能、不能掌握以知识为基础的程序、不能利用技术变化的国家，即使在世界经济有力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会落在后面。事实上，它们同世界经济的结合并不一定能防止它们的落后。也就是说，目前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后可能更会边缘化。

48. 世界经济日益以知识为基础，对国家政策也会起到很大的影响。扩大知识、提高技能、让更多人能得到信息，必须成为政策的重点。这意味着需要承担不小心的任务。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没法接受这种挑战。这点，在国际贸易制度的运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履行义务、通过世贸充分地参与贸易制度的管理，非常困难。这又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被边缘化的另一领域。

49. 知识、技能和发展的网络有两个相关的方面，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是否有能力从贸易和金融国际制度的运行中得益。第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本国的企

业，特别是那些中小型企业，无法掌握全球化产生的机会，无法分享世界上新生环境的繁荣。

50. 小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国家就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这类企业。它们之中不少有能力变成经济的骨干，由此而产生新生的企业家精神。但是，一个自由化、全球化、生产程序知识化的经济环境对这样中小型规模的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要想在这环境里维持、或提高竞争能力，需要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包括财政资源，这样的资源都不是一般中小型企业本身所拥有，也非它们所容易取得。它们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制订方案，提高电脑技能，鼓励研究机构相互之间进行联系，提供财力支助，帮助财力网络转让和传播技术。中小型企业本身能力有限，不容易充分地掌握和利用各方面的信息和知识。要想发挥集体的资源，中小型企业就必须找一家大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安排，在集团的构架里谋求自己的利益。

51. 第二点涉及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它来积极从事发展的能力。目前的看法是，发展的主要途径是知识和技能的转让，而这种转让则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公司与公司间其他形式的跨国合作。有一种合作是转让较简单的合作技能和低层管理技能，例如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在最贫穷的国家里生产或组合较简单的制成品。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设法提高中层和上层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让中上层有机会掌握、有效地使用先进技术。

52.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什么程度上能利用外资潜能、通过类似安排去填补知识和技能上的空白，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吸引足够的外资。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地理分配很不均匀，大部分的外资投于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

53. 其次，填补知识空白也要看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知识和技能转让必须配合、而不能取代一国本身的教育工作。发展中国家自己要作出一番努力去培训一支受过教育的工人队伍，授与这些人多式样的、经济上有用的技能，鼓励新技术的产生和利用。一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越彻底，它也越有能力通过外资利用知识和技能的转让。

54. 最后，知识转让也要看东道国是否作出努力，尽量地扩大外资流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东道国可以把地方上的中小型企业聚集起来，向进入市场的外国公司

提供货物或服务。这样的聚合和效应若能得到国家的鼓励，在很大程度上能促使外资较好地与发展结合。

55. 总之，在原则上发展中国家是有机遇的，它们之利用不了机会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缺乏知识和技能。这些领域正是国际援助的焦点。

3.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发展模式

56.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在设法与全球经济结合的过程中还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能确定应该采用哪些方面的国内政策，也就是说，不能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最适合与全球接轨。

57. 在过去十年间，各国际组织、主要援助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决策者对发展进程、以及对不能加速发展的理由都持有明确的、非常类似的看法。这种共同的想法把矛盾指向国家，认为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正是过去错误地根源。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国家必须放弃直接干预生产活动，将经济全面自由化，特别是将国际贸易自由化，让市场来“决定价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从此消失。新的方针表示，国家应加强其任务，为私营企业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预见的环境。国家的政策应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保证价格的稳定，特别是降低预算赤字，利用非货币的手段来弥补赤字；另一方面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商务的法律制度。对大多数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国家来说，这就是全面地进行法律改革。

58. 毫无疑问，任何有说服力的发展战略都必须包含上面所说的几点。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看得清楚，这几点内容尽管必要，却远不够充分：要取得成功，还需要一系列其他的政策目标和手段，而国际组织和捐助国在帮助拟订发展战略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政策目标和手段。

59. 有若干主题不够受注意。例如，发展格局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应比较均匀？专门化的格局是否有利于拉平发展水平？在国际上现有和新的学术论调是否不必要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它们无法配合发展战略、落实政策？如果是的话，是否应让发展中国家有较多的伸缩余地？最主要的，还是三个主题被人忽略：一、改善市场的运行；二、确保增长的代价和利益能得到较公平的分担；三、建立一个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60. 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潜能，首先需要市场发挥其适当的功能，给予经济推动者较多的信息，让他们多了解消费者的愿望，较有效地发掘储蓄，认明原料和其他投入的多寡，安排生产格局，使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都能受益。实行贸易自由化、放松规定、将企业私有化、开放金融市场，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61.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以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就必然能产生运行妥善、具有竞争性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般都比较小，销售方有时只限于几个较大的跨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可能是普遍的，自由化也不一定能如预期那样改善市场的运行。将一个受规章约束的专利公共部门由一个不受规章约束的私人垄断集团取代，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同样的，如果撤除对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只是为了让几家大公司自己竖立壁垒，防止竞争，这也并不是一种进步。为此，要鼓励竞争就不能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不能不由国家来推动、拟订和落实一套竞争政策。

62. 金融界也如此。如果没有国家的行动配合，自由化也就不一定能取得所预期的效果。金融界的私营实体——特别是银行——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构架，配之以管制和监督，否则也不可能运行完善。要维持安全、保持稳定、提高透明度、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都不能没有一套规章制度。随意自由化，不对之适当地加以管制和监督，无论是对金融制度或对全面的经济都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63. 过去发展的模式没有在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方面制定明确的目标。一般都以为，一个能迅速促进增长的模式必然能为大多人造福。一般也以为，政府会采取步骤，保证满足最起码的收入分配标准，安排一个社会安全网。但是，由于模式本身没有在这些领域制订明确的目标，一旦象模式所要求精减预算开支，精减的需要就必然同没有明言规定的最低限度社会目标成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目标只得对精减的需要让步。这样的矛盾，除了带来必然的社会后果之外，对发展也非常不利。因为在当前世界上，知识和技能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削减教育经费开支必然使发展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预算精减也使国家无能力缓和和解决社会冲突，破坏了社会的团结，使大家感觉到增长是一个不公平的进程。其实，说到底，如果缺乏公平感，模式也就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政治上必然会失去它的合法性。

64. 当前的发展战略是很不公平的，一般忽略了最易受打击群体、特别是妇女的福利。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社会 and 经济发展的一大股潜在动力一直没有

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未来世代的福利也受到威胁，因为环境问题一般不会受到决策者的充分注意。如果不能将这许多缺点加以纠正，那么，这样的发展战略本身恐怕也不能持久。

65. 最后还有一点，要使国内发展政策生效需要什么样的外部环境，模式对此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举个例，在施压力将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就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动态。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不一定允许它们更多地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希望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同时又不多给它们援助。总之，当前的国际制度并不是十分支持发展，有时甚至是反对发展。

第 二 章

迈向国际对增长和发展新的承诺： 改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管理

66. 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效的应付外部环境的缺点，克服不发展的障碍，让发展中国家回到正轨，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相结合。¹⁰

A. 对高度、稳定增长作出承诺

67. 要让所有国家、所有社会群体都能从全球化得益，一个必要、但也绝不是充分的条件是，国家的收入和产出能高度、稳定地增长。宏观政策需要明确地制订目标，支持增长，稳定增长，同时高度优先地维持相对的价格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必须转移政策的重心点，在多边借贷机构的协助下拟出一套调整方案。追求有效的、面向增长的宏观政策还需要配合全面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环境，有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行，特别是有利于私营部门的发展，让私营部门的投资决定成为增长的焦点。

68. 工业国家实现高度、稳定增长本身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必要的条件，非此，贸易和金融制度不可能有效地运行。这首先需要工业国家当局将它们的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同时避免通货膨胀。一方面，工业国要维持它们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国际制度也需要能够对发展提供有效的支助，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是多方面的。很明显，如果工业国出现衰退，这就会影响到初级商品的价格，增加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国家预算上出现困难，无法维持援助资金的流动。反过来，如果工业国出现通货膨胀，这又会导致利率提高，增加国际资本市场上借贷的负担。

69. 工业国需要较有效地监督宏观政策，全体走上一条高增长、没有通货膨胀的道途，充分地考虑到每个国家里膨胀和收缩压力之间的差异。这种监测主要是预防性的，在出现失业和增长放慢的迹象时及时发出警告，同时也注意国内货物、服务和资产价格的演变、外贸收支的恶化，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压力。

B. 便利国际贸易、金融和知识

70. 管制金融和贸易的制度必须真正地、明显地同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要。把“球场压平”的概念在发达国家里很流行，却不足以保证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全球性制度得益。要机会平等，首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全球性制度，以保证大家都能享受到原则上所应有的利益。也就是说，球场不应仅仅是“平”，而且应“公平”。这就需要比较灵活的规章和程序。要机会平等，全球制度里还需要包含一定的教育、培训和其他活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个制度下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1. 贸易制度：使市场便利发展

71. 市场不是一种没有人性的东西。市场的背后是各种国家和国际的体制构架，左右了市场所产生的效果。在这许多构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管制世界贸易、促进竞争的体制安排。

72. 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议程应让所有世贸成员都满意，承认它是全面的、平衡的，涉及到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新的谈判议程必须比乌拉圭回合更面向发展。上面已提到，当前全球化危机在发展中国家里已引起了很大的政治反响。如果我们仍然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赞助这轮新的谈判，那么，他们就必须能够说服他们本国的人民，让大家都看清楚：谈判确实有能力解决本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让他们的本国也能通过国际贸易真正地得益。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快同世界贸易制度接轨，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政治问题还是：同世界贸易制度接轨之后如何能加速发展。

73. 这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贸易自由化。对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降低贸易壁垒是实现发展的一条主要途径。由此，决定单方面自由化也好，决定在多边或区域范围里实现自由化也好，都是完全合理的。但是，需要重提一下，自由化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单纯地取消贸易壁垒，而是要有节奏、有方法，以争取更快地发展。调

¹⁰ 本章的背景分析见《199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整生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能只把调整期拉长作为过渡。在一系列的领域里还需要采取别的政策与之配合，例如：帮助进行调整的国家取得外国投资和风险资本；便利它们接受新的技术，找到新的国外伙伴；采取积极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重新培训工人掌握新的技术和活动；提供失业保险；提供基础设施、工业设施和支助服务，等等。政府应设法避免价格控制。但同时也要注意：撤除了贸易壁垒之后国内市场应能发挥它的竞争能力，运行完善，发出能鼓励生产者和投资者的信号。撤除贸易壁垒必须配合适当的竞争政策。贸易自由化要有节奏，分阶段进行，让必要的辅助政策也能同时落实。

74. 说得更广泛一点，世界贸易组织希望制订一套普遍性的规则、特权和义务，对世贸全体成员一律适用。但事实上，世贸成员各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在理想同事实之间要取得一定的平衡。一轮面向发展的谈判必须要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就是，义务和履行义务的期限必须配合世贸较贫穷成员的需要和能力。特别待遇和分别待遇必须成为新的国际化概念，由国际贸易政策用这个关键性的工具去解决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要。

75. 如果新一轮贸易谈判能采纳一个面向发展的议程，那么，这个议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议题的内容似乎可分成下列几大项目：

- 便利发展的进一步自由化，特别是将农业贸易加以自由化，承认农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世界需要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农产品方面需要一定的服务；移民接受国对自然人的流动必需作出更多的承诺，但同时也要制订更严格的标准凭以证实人口流动确实有经济需要；
- 减轻关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减低高峰的农业关税和工业关税；
- 更严格地限制补贴，特别是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大幅度地减少农业生产和投资补贴；
- 更严格地约束反倾销税和抵销税；
- 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特别规定，包括：让它们的产品免税进口，让它们自由取得更多的服务；
- 鼓励发展中国家多出口对环境无害的产品，但也不要搞太多新的条件；

- 改善普遍优惠制安排，考虑在国际上是否能议定一套逐步取消优惠的标准，同时不要在普遍优惠制安排里制订太多的条件；
- 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能以优惠、公平的条件进入国际贸易组织。

76. 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步骤重新审查竞争政策，设法拟订、更新一套管制竞争的国家和国际规则，目的是要确保跨国公司不会利用它们的大规模经济和财政力量从事不利于当地企业的反竞争活动。特别重要的是，不要让外来的企业人为地阻碍当地企业进入市场。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搞合作安排、战略联盟，另一方面却要防止反竞争性的活动；如何鼓励当地企业接受更多的外来竞争；如何平衡市场竞争和社会目标，例如，多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富悬殊。

77. 竞争政策仍然是国家立法和监测的对象。但是，国际合作也是一个新的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在搞许多双边和区域性的协定，正证实了这一点。

2. 发展的资金结构

78. 发展的国际资金来自：国外商业性借贷、官方发展援助、多边借贷机构的经常性贷款。这些多边性机构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钱，然后把钱转贷给发展中国家。

79. 这三种外资形式基本构成了发展的三角资金结构，如果一角站不住，整个结构也就不能稳定。最近，金融市场触发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是，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虽然不那么受人注意，同样地也是危机重重，需要国际行动的援助。

80. 许多援助国在逐渐地减少官方发展援助，这种趋势必须赶快加以扭转。没有援助，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改善管理，发动国内资源，在保健、教育等关键领域提供基本服务，在大方向上响应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的号召，拟订和落实消灭贫穷行动计划。特别是援助国政府应作出承诺，重新放开步伐，争取达到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指标。

81. 今天，多边借贷已同债务的问题分不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债台高筑的贫穷国家采取了主动，针对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新概念，拿到国际论坛上讨论。但是这种主动只适用于很少几个国家，即使适用，也落

实得不够快。这可归咎于执行工作上彼此相关的两点：拨给沉重负债贫穷国家信贷基金的资源不足，用以衡量资格的标准限得太死。

82. 现在确实有必要在援助债务沉重贫穷国家的广泛构架里快一点全部勾销这些国家的外债，只要它们愿意把因此盈余的预算投入为国际赞同的方案，扩展保健和知识基础设施的基本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培训。这样大胆的做法能勾销许多永远付不清的债务，恢复债务国和捐助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做也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提高最贫穷债务国的生活水平，将勾销债务同促进社会福利直接挂钩。

83. 这样的政策行动要取得效果，首先需要在目前的援助之外另设资金作为后盾，而且应配合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措施，以保证原先债务国的政府有能力有效地把预算开支投入社会用途。此外，援助国还应作出承诺，确保今后能以适当的条件向穷国提供援助。

84. 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来源。如上文所说，东南的金融危机暴露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国际金融界日益复杂、日益活跃，却没有一个适当的体制构架去管制它。金融危机还突出了另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政策方法能控制资金流入流出的规模和性质。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交易迅速自由化的同时没有充分谨慎的管制机制，是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一触即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85. 现有的金融建筑有许多我们应当正视的缺点。为此，需要采取下列国际行动：

- 加强对金融界的监督和管制，确保及时得到警报。问题是要设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管制和监督机制，同时兼顾国家金融结构和传统方面的差异。针对这点，有人建议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管理局，或者是一个全球金融管制常设委员会，负责制订必要的国际准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管制和监督，同时注意这些准则在国际一级的落实；
- 让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自己采取政策控制资金的流入。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常碰到的困难是：一方面希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尽量地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护自己，避免金融界全球化内在的危险。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以最适合它本身的方法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国家在有些情况

下用市场方法去缓慢资金的流入，例如，对每项资金流入抽少量的税，或规定非本国居民在银行里保留一笔后备储存。采取这样的反鼓励措施是要设法减少一大笔涌入的资金，特别是不鼓励最不稳定、最容易突然流失的资金的涌入。在特别的情况下，资金流出的反鼓励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 在碰到危机的时候提供适当的国际流动资金。有些国家更积极地使用补偿和紧急资金借贷方法，这个方法为那些易受金融感染冲击的国家设立一个条件宽大的借贷安排，让国际货币基金能取用更多的资源，包括利用一些创新的程序，例如，直接向资本市场借贷；
- 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去应付资本流失。一个国家碰到资本流失，就象一个银行突然碰到一大批用户抽取存款，或者象一家公司突然借不到钱，而债主又来催债，要求它立即还清所有的债务。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法定程序帮助私人银行或公司应付这样的困境。这些法定程序在每个国家不一样，一般都规定一段暂停付款期，让公司免受催债。在这段暂停期间，双方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同时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这样就可以避免债务人宣布破产带来的混乱，对双方都有利。在暂停期间，公司能够继续正常经营，而且为此能够获得必要的新贷款。在国际领域里，应当也制订类似的程序，让债务国有可能暂停还清外债，并有可能将债务转变成资本。为了保证一个国家只有在资金外逃失控的时候才宣布暂停付款，这种暂停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认首先必须由国际货币基金认可。暂停付款期不能过长，在这期间，债权方和债务方必须设法作出有条理的安排，将债务的偿还期延长。在这暂停付款期间，该国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国际货币基金出钱资助。

86. 当然，要执行上面所说的程序既不容易，也不简单。例如，除了立即可见的困难之外，要适当地执行暂停付款程序，可能需要改变国际借贷协定的方式。但是，国际一级设立的保护机制同国家一级设立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希望各国能有效地应付金融的全球化，设立这种保护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3. 为发展逐步加强知识的管理

87. 前一章已说过，发展中国家缺少必要的技能，得不到必要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在它们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候，无法充分地利用原则上涌现的许多机会。要加强世界经济的管理，这个问题非设法解决不可。

88. 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利用知识，这程序牵涉到许多方面，既受到国家和国际政策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国家和国际政策。

89. 跨国公司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技术改变了快慢由它们来决定，因为研究发展由它们来搞，而它们又同国内外的研究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跨国公司的关键作用还在于：它们决定使用那些新技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市场上使用这些新技术。跨国公司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限制了这些机会，这点在前一章已有叙述。

90. 发展中国家国内的企业和研究所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源，无法针对今日技术进展的多专业性质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它们最多只能吸收现有的技术，加以修改，或者通过同其他公司的商业关系设法掌握技术。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获取情报、分析情报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91.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策能帮助它们的本国公司掌握知识，利用知识发挥商业优势。它们的国家政策在下列领域最关键：针对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鼓励教育培训；通过专业研究机构创造知识，应用知识；鼓励本国企业从事研究发展；建立渠道，推动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

92. 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制度是将知识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构架。这些国际制度笼统由世界产权组织管理，同时，通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产权制度设法建立可行的平衡，一方面照顾到产权所有者有必要靠他们在知识方面的投资适当地收回经济利益，同时也照顾到知识迅速、无限制地传播能为广大的社会造福。近年来，这种微妙的平衡日益倾向于保护产权拥有者的权利，不让知识随便传播。这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权的规则范围已被扩大，覆盖了越来越多样的产品、程序和生物方式。过去，落后国家一直是靠模仿和拆合来弥补技术和经济差距，这样做现在已越来越困难了。

93. 发展中国家取得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程序牵涉到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企业界有效地利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能​​力又牵涉到另外许多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现在需要合在一起解决，同时考虑到它们之间各种的相互关系。

94. 针对这些问题不妨发起一场国际性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认明用什么行动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参与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世界上主要搞知识的是：私营商业部门；生产知识、消费知识的民间社会；政府和国际机构。因此，这三方面都应当——实际上是有必要——参与这场对话。

第三章

贸发会议：一个为发展事业服务的 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

95. 贸发会议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创造和传播面向行动的知识，设法移动全球转变进程的方向，尽量地扩大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贸发会议的方针是：进行研究，分析政策；通过政府间的讨论取得协商一致；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援助，建立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换言之，贸发会议的任务是：多思维，多协议，设法将概念和协议变为事实。

96. 贸发会议的一个中心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了解世界经济的全面运行。贸发会议把重点放在财经、贸易、投资和技术创新各领域问题的不断相互作用，而不是静止地分别探讨每一环节。贸发会议把通过分析所得的认识用来作为一个出发点，以此纠正全球制度的不平衡，改变国家策略的错误，强调国与国间的相互依存。

97. 贸发会议的任务是帮助全球化“一砖一瓦”地盖得好一些，设法缓和全球制度里的矛盾，让这个制度接受比较道义的目标，克服贫穷，减轻社会上和国与国间的不平等，保护今后世代享用环境的权利，让妇女平等地与社会结合，让边缘化的人们能够充分地参与市场经济。在各领域中，贸发会议的任务都是以发展前景为优先，特别强调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和小规模岛屿国家经济的发展问题。

98. 对任何一个机构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任务，何况贸发会议又没有什么钱。要任务成功，贸发会议必须多同民间社会结合，向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私营商业界求教，多利用它们的专门知识。贸发会议还应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组织和实体及同区域组织多密切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贸发会议需要将它的工作重点放在它能起到最大影响的那些领域。也就是说，贸发会议应多做它的所长，少做它的所短。

99. 这并不意味着贸发会议秘书处应突然结束某些领域的工作。但是，贸发会议确实需要认明一些问题领域，将之作为贸发会议任务的重心点，在这些方面多做贡献，围绕着它们来确定和组织其他的问题领域。下面，我们就是要试图认明这些中心领域，探讨一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并不是要想为秘书处提出一份全面的工作方案，只不过是要用新的、较严谨的方法去审查一下贸发会议的工作前景。这

个方针有配同的一面，就是要重新确定今后的活动，重新分配在这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

A. 中心问题领域

100. 贸发会议最能胜任的是它创始时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通过发展中国家同世界经济和贸易制度的最有效结合来促进发展。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象上文所说，关键不在于国际接轨的幅度，而在于这种接轨的质量。在当今世界上不难看到，有许多国家太依赖外资，太依赖少数几样商品，太依赖集中于一个经济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帮助一个国家可持久、公平地增长的接轨。

101. 二、尽管贸发会议主要注意的对象是全球制度而不是其中的每一环节，但也绝不应忽略了内在的关系。贸发会议的工作焦点是要设法了解外部环境和国家战略彼此间的积极作用，了解它们如何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变化。贸发会议不应重复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工作。后者设有许多驻地办事处，以国家、而不以全球制度为对象。但是，贸发会议同开发计划署最近也联合发起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项目，在地方上试探全球性分析研究同国家政策咨询之间的联系。

102. 这里主要想说的是，外部环境和国内战略到底孰轻孰重，这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全球化最明确的定义是：“世界上每一件事对国家、对地方都有关系，而反过来，在较轻的程度上，地方或一国的每一件事也会关系到全球制度”。

103.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贸发会议的任务不是教发展中国家尽快地同世界经济制度接轨，不管其代价或后果如何，而是鼓励它们在贸发会议的帮助下谈判如何进入全球制度，尽其可能现实地——但也绝不要越过现实——使全球制度较灵活地响应它们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不应不管内容签合同加入，而是要谈谈加入的条件、加入步伐的快慢。

104. 考虑到这种积极的相互作用，贸发会议要围绕这三个主要问题领域安排其工作：一、关于全球化、依存和发展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分析；二、贸易和发展；三、投资和发展。

B. 了解全球化、依存和发展的相互作用

105.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除非配合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变化的主要潮流，否则不可能讨论发展问题。贸发会议需要加强其努力，帮助澄清这种全球性的趋向，更好地认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特别考虑到这些趋向和动力对发展的意义。贸发会议这个政府间机制应经常地审查世界经济的发展，把资金、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相互关系及其对贸易国家经济的影响作为审查的重点。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有特殊需要，贸发会议对之应另加注意。

106.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工作方案也同样地应把重点放在世界经济主要领域的相互依存问题上，强调宏观经济管理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的影响。金融和货币问题应配合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分析，不能单独分开对待。发展的资金来源应受到特别注意。贸发会议应多探讨什么机制系统能最有效地集合发展资源，特别突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债务之是否能持久负担；外部资金来源和内部资金来源——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债务、私人投资——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分析目前可说是及时，因为亚洲危机引起了关于金融建筑的大辩论，大家都看到 29 个所谓新兴市场的困境。贸发会议的任务是，要确保其他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能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债务减轻或开发资本市场的新办法取得一定的资金，继续发展。贸发会议的三篇大报告，即：《贸易和发展报告》、《世界投资报告》、和《最不发达国家报告》，需要彼此更好地结合、更好地配合。

107. 贸发会议有必要根据上面所说的全球性现象反省发展的经验，吸取发展策略方面的教训，以便就发展问题取得更深的认识，把这种认识传播给发展中国家。贸发会议应多做比较性的分析，多探讨全面经济开放会带来什么正面、什么负面后果。

108. 贸发会议的研究分析应尽可能地面向行动，通过政府间的程序用以作为多边协定的基础，并应能够在地方上落实。

109. 贸发会议特别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的债务，一方面分析，一方面帮助它们管理这种债务。贸发会议已成为联合国系统里讨论债务问题的中心点，最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减轻债务的建议。这项工作应继续下去。G-8 国家在科隆作出的决定是一种进步，但也并没有用尽所有可能的政策手段。减轻债务就象贸易自由化一样，是一种“骑自行车”的动作，一旦不前进就要摔交。

110. 贸发会议秘书处在执行其工作方案时应特别注意过渡经济国家和结构上脆弱、经济易受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此外，象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减轻贫穷、授权妇女等相互关联的问题也应得到适当的注意。

C. 贸易和发展

111. 贸易是贸发会议工作的灵魂。发展有许多内容，把“贸易”二字突出来放在组织的名称里，并不是偶然的。自然，这同贸发会议在 1960 年代中期诞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那时国际上大家的口号是：“多搞贸易，少搞援助”。

112. 今天，这个口号仍然合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使贸发会议在这领域里的任务更为重要，这点，从关于落实乌拉圭回合协议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明显。

113. 贸发会议已开始同世界贸易组织合作，在这踏实的基础上在两个主要领域发挥作用。第一个领域是协议的谈判前和谈判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焦点应明确：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拟出一个积极的、面向行动的议程。贸发会议的目标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作出准备，参与下一轮的贸易谈判，这样，就有希望把发展问题放在谈判的中心。贸发会议要多进行商业外交，搞出一套贸易的体制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也是这种商业外交的一环。现在有些国家发起主动，要把多边贸易制度的界线往外推，更多地使用贸易制裁。贸发会议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评审这种主动的含义。通过分析认识和了解贸易格局的新趋势、了解这种趋势为发展中国家以及对整个贸易制度的意义，也是贸发会议在这方面不可少的一份工作。

114. 第二个问题领域是执行。要强调建立、改善机制能力，多利用多边制度、区域协定或洛美式的合作安排所创造的贸易机会。

115. 固然，贸发会议在贸易方面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参与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但是，贸发会议的活动范围远不止此。还包括：分析和了解国际贸易和市场的新趋势和发展，以便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过去和今后贸易谈判所开拓的机会；也包括传统的贸易和发展议题——例如，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的国家的问题——以及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新出现的挑战——例如，电子商务。

1.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的正面议程

116. 贸发会议在贸易方面还有一份中心任务，就是，在下一轮的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拟出一套所谓的“积极”议程，帮助它们认明一些对它们有利益关系的贸易问题，彻底地了解这些问题，审议一些谈判用的政策选择。当然，贸发会议不能建议用什么选择最好，这要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本身来决定。但是，这里牵涉到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没有充分的了解很难作出决定。在贸发会议的帮助下，谈判本身可以更为深入，谈判的结果也更丰富、更持久。

117. 发展中国家在一些中心领域需要确定政策目标，这些领域在上文第二章讨论新一轮贸易谈判面向发展的议程时已一一指出。这里要谈的是一些特别迫切的问题。

118. 其中一个问题是，将世界贸易组织的“特别和分别待遇”概念加以刷新。这里需要指出一些具体例子，说明为什么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或履行贸易义务、或实现贸易权利、例如解决争端等方面往往会特别吃亏。在这些方面，贸发会议秘书处和其他一些专家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用的。

119. 竞争法律和政策又是另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象上文所说，除非市场允许不断地竞争，否则，即使搞自由化、私有化、撤除更多的规定，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仍不一定能得益。贸发会议应针对竞争法和政策继续进行其分析和业务活动，特别注意国际上的竞争，探讨不同的政策对发展有什么影响，创立一个竞争性的环境。

120. 贸易政策影响到环境，这是免不了的。贸发会议可发挥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认明一些领域，利用环境关注所带来的贸易机会，针对贸易和环境问题拟订一套积极的议程。

121. 这些活动应在贸发会议的政府间机制中反映出来。例如，可多召开专家会议。因为过去，这种会议相当有用，有助于认明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贸发会议也可直接从事技术援助活动，以确保研究和专家会议的结果能在地方上落实。加强国家的能力是关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帮助一些国家的学院——不论是政府办的、还是民营的——拟订它们自己的商业外交培训课程。贸发会议秘书处应直接同国家合作，帮助国家政府制订和实现谈判目标。另一个例子是：

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三方合办的技术援助方案，目的是帮助选定的非洲国家培养贸易能力，这个方案已成为贸易界能力培训的一个范本。

122. 区域和分区域结合和合作也能使发展中国家加强它们的竞争能力，便利它们进一步地与世界贸易制度结合。贸发会议应帮助区域和分区域集团搞这些合作，同时也审查区域合作是否能影响到多边贸易制度的演变。

2. 商品的重要性

123.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部分的出口收入仍然要靠商品。贸发会议应进行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过分依靠商品所带来的困难，同时尽量地利用随时出现的机会。贸发会议应不断地审查分析国际商品市场，提供统计数字和其他数据，提高商品市场的透明度。

124. 更具体地说，贸发会议应帮助发展中国家评审政策选择，提高商品部门的效率和产出，使商品部门进一步多样化，把加工、销售和分销联系起来，从事增值程度较高的活动。贸发会议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尽量地多参与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在期货方面，贸发会议可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市场手段减少价格风险，争取资金投资。

125. 贸发会议也能多作出贡献，在商品领域建立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机制，特别是搞一些论坛，让生产者、消费者和国营和私营的贸易公司多交换信息，作出预测，使商品领域的决策更为合理化。

3. 服务和电子商务

126. 毫无疑问，通过电子商务，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潜能扩大服务出口。在这方面，贸发会议可帮助它们认明新的机会，拟订国家和部门战略，提高它们的出口能力。

127. 电子商务今后预期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贸发会议应加强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活动可包括：多作分析和统计研究，探讨电子商务对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前景预期会有什么影响；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有关电子商务的问题上拟订一套政策方针；帮助设计和执行政策方案，让中型、

小型和微型企业有更多的能力利用电子商务，让发展中国家能较积极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电子商务的讨论，特别是关系到过去关贸协定所组织的谈判。

4. 贸易效率

128. 在今天高度竞争的贸易环境里，降低从事贸易的代价必须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优先事项。贸发会议必须朝向这个目标作出更多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充分实现参与国际贸易制度所获取的利益。贸发会议的活动必须针对多方面，包括运输、关税、贸易资金、以及同国家和国际法律制度有关的问题。此外，贸发会议应特别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必要的技能和专门的知识，让它们能应付这些复杂的问题，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变化。贸发会议的活动还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拟出一套行政和管制措施，以创造条件，便于发展运输能力，谈判、执行双边和区域货运过境协定和安排，同时设法改善过境制度，进行关税改革，在关务上实现自动化。

129. 贸发会议还应特别注意进一步地协调配合两种次方案的工作，即：执行贸易协定的次方案和发展、提高贸易效率的基层服务业次方案。发展中国家如要搞一套全面方针，克服体制性的限制，执行和更好地利用贸易协定，那么，它们一方面就必须掌握电子商务，同时进行关务现代化，降低运输和其他交易方面的开支。在这些方面，贸发会议能作出特别的贡献，在政府间协定和技术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供更多的政策咨询。

D. 投资和发展

130. 没有投资就不能创造新的生产能力，也就不能发展。投资主要是为私营企业建立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当前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同国家的技术能力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要看到通过投资所转让和创造的技术，就不难体会到投资对发展的影响。企业对投资的决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既能挖掘、也能淹没发展的潜能。因此，企业的兴起必然联系到一个国家所得投资的数额、组成和对发展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自由化的世界经济里，企业在一个国家里兴起，免不了就联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活动，成为一股国际化的潮流。

131. 贸发会议是一个政府间的机构。由于这种性质，在这领域里它要把重点放在各种投资的国际方面，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多注意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多注意企业的国际化。当然，国际投资和技术流动必须从属于本国的努力，所能起到的还是一种催化的作用。贸发会议在这方面拟订工作方案时，不能不考虑到国际投资、技术流动和企业的兴起之间的相互关连，同时考虑到国家在这方面不断作出的努力、采取的政策和面临的挑战。

132. 更具体地说，贸发会议在投资领域的工作应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通过国际投资的流动、特别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资公司的国际活动使其本国经济受益。这意味着多吸取国际投资，利用这种投资来扩大本国的生产和创新成分，多同本国的经济挂钩。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贸发会议的帮助，使外国直接投资配合它们的发展目标，尤其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从事发展，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还必须把国际投资作为一种手段，利用全球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所提供的技术转让，通过企业间的安排、联盟、伙伴关系和各种其他形式的技术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能力。增加外国直接投资能使本国企业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国际上能够竞争，占得住脚；特别是让中小型企业能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技术和贸易联系，进行合作，成立贸易网；一方面是使市场更具有竞争性，同时也可以知道哪些企业上的问题可能需要国际一级的注意。

1. 研究和政策分析

133. 贸发会议今后的工作应设法使发展中国家更多了解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技术流动、企业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景所起的作用。这意味着随时要审查世界经济里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审查跨国公司的政策和做法，以便更好地认识全球性趋势，认明哪些企业战略正在形成。

134. 特别要注意的是，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会影响到本国投资，技术变化和技术流入会影响到多国公司的政策和做法，最终出现新的企业管理方式。

2. 能力的培养

135. 发展中国家对这些相互关联领域中的问题有了较好的了解之后，需要在国家一级得到有效的帮助，拟订和执行政策，吸引和利用国际投资，加强技术能力，促进企业的发展。贸发会议应：

- 帮助发展中国家拟订策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考虑用什么方法去刺激这种投资，在本国发展战略里如何最有效地把外国直接投资用于下列两个方面：(a) 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地方的中小型企业供应网之间建立联系；(b)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有效地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生产和分销网络，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获取专门知识、管理技能等；
- 帮助发展中国家针对投资、技术和企业的开发拟订综合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把国家的投资和技术政策放在一起审查；
- 帮助发展中国家拟订策略，如何最好地发起地方上的企业，围绕着这些企业不断地更新，让它们在国家市场经济里扮演主要的角色，一方面供应国内市场，同时有能力出口。

136. 这些活动应当相互结合。任何一方面，包括国外直接投资，都不应独立地分开考虑，而是要把各种活动看作整体中相互联系的关节，同时要考虑到实际的用途，即：刺激投资的手段、投资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审查、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的准则、发展中国家间双边或区域投资条约的谈判。

3. 鼓励看法的一致

137. 贸发会议的分析 and 业务活动有必要促成国际上的一致看法，便利作出安排吸引和利用国际投资，培养技术能力，鼓励企业的发展。目前，大家签订了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区域投资条约，作出了双边税收安排，都意味着看法趋于一致。大家日益热衷于讨论投资的多边性质，贸发会议也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多了解这种讨论对它们发展事业的含义。

138. 一系列的国际协定，包括《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等，都列入了有关技

术转让的条例。贸发会议应审查这些条例，以便建议用什么方法使它们面向发展地得以落实。

139. 关于跨国企业问题以及关于企业的国际化，在国际上也逐渐出现了一致看法，特别是处理个别企业的政策方针逐步协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贸发会议做了不少工作，为会计和报帐拟出了一套国际标准。

E.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

140. 贸发会议为了实现其发展任务，一直特别地注意困难最多的国家的问题。每届贸发大会都通过了具体的工作方案，发起一系列的活动，设法满足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其中许多也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和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贸发会议还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 1980 年召开了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在 1990 年又召开了一次后续会议，目前正在准备在 2001 年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141. 近年来，许多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一定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但是，它们的基本指数表明，它们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差距。它们债台高筑，外来资金不足，所得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出口市场有限，受到严重的供方限制，人民福利恶化，受到越来越多人和自然灾害的冲击，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最不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人口，特别是妇女，仍然无法摆脱极端的贫穷，受到社会的排斥，使情况更为恶化。国际社会继续有必要提供合作，解决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受冲击的国家能作出较强烈的供方响应，要求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伙伴对它们提供更多的外来援助。《1990 年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除其他原则外，承认：最不发达国家本身负有主要责任拟订和执行有效的发展策略，但它们的发展伙伴也有义务对它们的努力提供适当的支助。

142. 贸发会议通过研究分析，以及通过它的技术合作方案，应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接轨，特别是落实一些方案，在一个环境上可持久的发展构架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能力。在这前提下，贸发会议应多注意内陆和岛屿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需要。贸发会议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贸易的体制上面，让最不发达国家有能力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拟订和执行一套与之配合的贸易政策。同样，贸发会议应帮助非洲国家设法更有效地参与多边贸易制度。

第 四 章

伙伴关系和效率：增进贸发会议对发展的影响

143. 为发展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也是贸发会议存在的理由。为了产生最大限度的影响，必须统筹兼顾，一方面为思考和行动进行分析和政府间审议，一方面进行技术合作。贸发会议的分析 and 政策结论必须成为它提供咨询意见和业务活动上的援助的根源；进行技术合作时也应该通报贸发会议的分析 and 规范工作，为此阐明应该注意的问题、收集现场数据和经验以增进了解、并且提供政策执行情况的反馈资料。正是这些协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构成了贸发会议、乃至联合国的优势。

144. 但是，贸发会议显然无法孤立地充分发挥其发展作用。首先，贸发会议的工作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其活动触及贸发会议关注之领域的、一系列面向发展的政府间组织与机构中进行的。进行合作和相互补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分工、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是执行贸发会议发展工作的先决条件。

145. 但是，这种协作必须更进一步。同国家一级上的发展工作一样，国际上的发展努力必须考虑到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所有利害攸关者。最近的经验已经清楚地显示非政府团体能够丰富公众的讨论、展示本来可能无法充分表达的心声、并且改进现场发展活动的效率和适切程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私营商业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146. 因此，贸发会议的工作应该遵照统筹兼顾和合作的双重方针进行。统筹兼顾分析工作、标准化工作和技术合作，并且同与发展有关的各国际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和私营商业部门进行合作。

A. 技术合作

147. 技术合作包含两类不同的活动：

- 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提供咨询服务。这项工作来源于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提出的特定要求，对秘书处具有额外的价值，因为秘书处能

够经由提供咨询服务增进对发展问题和机会的了解、而且能够促进各国间的经验交流。

- 业务活动以能力建设为重点，活动范围包括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其内容包含秘书处的分析工作、软件和有关咨询及培训方案的提供、以及秘书处工作领域内之信息和数据的传播。

1. 经常方案和预算外方案的连贯性：确立优先次序的挑战

148. 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多半由指定专门用途的预算外资源筹供。这符合联合国范围内历来的共识，即凡是以满足某一具体国家之特定需要为唯一目的的活动均不对联合国的经常性集体资源构成负担。近年来，为贸发会议的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筹供的预算外资金在秘书处现有总资源中的比率介于 30%到三分之一之间。

149. 自从上届大会以来，分析和业务工作之间的区别已经日益明显，从预算外来源筹供业务工作所需资金相关的理由也需要修正了。首先，贸发九大的最后文件明确地把咨询活动和技术合作活动列为贸发会议秘书处职权范围内经常性工作方案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贸发会议方案预算中为一些特定的技术合作方案编列了经费。反之，由预算外资金编列经费的项目，因为是随后执行政策咨询和业务工作的先行项目，虽然包含了研究和政策分析工作，仍不予列入。

150.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由预算外资源供资的技术合作，无论是行政管理工作、还是实务工作，都需要支助。为此目的，各项目为支助费用和间接费用编列了经费，目前占项目执行经费总额的 10-13%。但是，对一系列国家和国际组织筹供经费情况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对间接费用所作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比率约为 25%，这意味着：对预算外项目的支助中有一大部分属于经常预算的范围，主要表现为常设工作人员的时间。因此，要开始执行由外部来源供资的新技术合作活动，就需要由经常预算加以补贴，从而引起了如何规定能由秘书处现有支助经费予以支助之预算外业务工作的最大限度问题。换言之，秘书处对进行更多由外部来源供资之技术合作活动的匀支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虽然还需要对这个事项进行更加详细的审议，现有迹象似乎显示，在若干领域内，秘书处已经达到这个极限，而且对个别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支助可能开始干扰秘书处经常性工作方案的执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对贸发会议工作方案管理的一项重大挑战。

151.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贸发九大的最后文件已经具体地对此作出了规定(“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TD/377,第 96 段)),并且把它列为贸发理事会 1997 年通过的技术合作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在这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为了利用并促进秘书处的分析工作,已经拟订了贸发九大以来开始执行的一些主要的技术合作方案。第一个事例是在贸易谈判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拟订积极的议程,由秘书处在经常方案范围内进行的贸易问题分析现正通过商业外交领域的培训和研讨会以及讲习班宣传业务方面的活动。另一个事例是研讨如何建立多边投资框架问题,为了增进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必须进行研究和分析,并采取政策咨询的方式加以传播。第三个事例是进一步统筹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工作和对债务管理的业务工作(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在这些领域和其一些领域,经常性预算工作已经随着预算外供资项目的拟订而得到了扩展。

152. 但是,为了以富有创意的方式加强就分析工作和业务工作采取综合行动,能够、而且应该、进行更多的工作。这就引起了棘手的优先次序问题,也就是供作出决定、以便就方案和特定项目开展技术合作新活动的依据问题。

153.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技术合作和项目的拟订乃着眼于下列三种不同的因素:

- 发展中国家政府或机构等可能的受援国提出要求或表示感兴趣;这种要求或表示有时候是贸发会议或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进行了需求评估或方案拟订作业的结果;
- 开发计划署、其他多边或双边捐助国作出支持某种活动的决定;这种决定可能是具体的决定,也可能是秘书处据以同捐助国磋商经费分配事宜的粗略方针;
- 秘书处对执行某一拟议的方案或项目之可取性的评估。评估的标准如下: (a) 贸发会议是否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职权? 拟议进行之活动的专题是否属于贸发会议工作方案优先次序的范围? 处理职权问题的出发点载于“促进增长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第 97 段和其他段落,其中规定了贸发会议应该集中进行技术合作的领域;载述任务授权的其他依据载于大会决议、中期计划中所载的方针、贸发理事会的方案预算和决定; (b) 秘书处是否在技术上能够胜任、而且已有经费、能够在不妨

碍其他经授权进行之活动的前提下支持该方案或项目？(c) 拟议进行的活动能够以何种方式利用贸发会议的经常性工作并且加以促进？(d) 潜在的受援国为方案或项目承担义务的意愿有多高？(e) 该项活动能否增进受援国促进发展的能力？最后开列的两项要素特别重要：技术合作基本上应该由需求驱动并且能够促进能力建设。

2. 经常方案和预算外方案的连贯性：资源管理

154. 上面列举的各项标准应该已经足以展示试图为预算和预算外方案的连贯性拟订战略时可能掉入的陷阱。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战略不仅涉及秘书处的决定；秘书处的同意是进行拟订的必要条件，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不过，秘书处对这些决定提出的建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监测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并且评估这些项目的成果是随后必须由秘书处承担的职责。改进在秘书处范围内履行这些职务的方式具有促进作用。

155. 这方面所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妥善兼顾，一方面由各司和方案管理人员针对各个潜在受援国和捐助国的着手方式、发挥其创造力和企业精神、使贸发会议尽量回应成员国的愿望；另一方面则考虑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进行优先次序的确立工作和管理工作、以避免分散和碎裂。

156. 贸发会议在九大以后，力图强调其工作应切合成员国的实际需要，作出了一些决定，容许各司和方案管理人员在确定项目、拟订项目和为项目筹资的初期阶段对业务管理行使大量的裁量权。在确定活动类型和资金来源方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以后，便需要采取中央管理方式。结果便产生了富有活力、很受赞赏的技术合作方案，确实吸引了更多要求进行适合现有财力之新活动的申请。但其缺点在于发生一定程序的散乱，还一度发生项目活动失控的情事。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在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周期的关键阶段进行较大程度的中央监督的时候。这种办法能够对经常性工作和预算外工作进行实质性的统筹、并对两种资源进行比较有效的管理，例如：较易针对技术合作活动的捐助情况作出决定。

157. 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 新设资源管理处，统筹进行经常预算活动和预算外活动的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这种办法能够对在外地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技术合作活动实行比较严密的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
- 将已经用于经常方案活动的规划、监测和评估手段的适用范围扩大，使其适用于预算外方案和项目。

3. 成员国的作用

158. 但是，上文已经说明，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基本上取决于包括受援国和捐助国的成员国的优先选择。导致上述困难的原因在于，某些政府要求拟订能使它们受援或由它们提供捐助的项目，而秘书处又不愿意拒绝它们的申请。

159. 直到现在，联合国技术合作中的主要原则历来是：在粗略的政策指导之下，政府间集体机制不应介入捐助国、受援国和秘书处在技术合作中的关系。这种做法遵循着上述供资安排。鉴于经常性活动和预算外活动日益交织在一起，可能有必要考虑采取替代性的程序和机制。新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大大增加技术合作中预算外资源的可预计程度，同时加强在政府间监督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的机制并且加强评价和估计影响的手段。

160. 新订的统筹办法内容如下：

- 设置一般信托基金，经指定用途和未经指定用途的资金都可以存入这个基金，最好是采取多年期方式，将邀请捐助国把现有的信托基金转入这个一般信托基金，如果他们希望保留其特殊和单独的性质，可以照办。一些独立顾问于 1994 年在一份报告¹¹中首次提出这个建议，但是后来没有得到政府间机构采纳；这种一般信托基金可以在适当时候包含目前为了保证有关技术合作方案资金的可持续程度正在审议的安排；

¹¹ Magaret J. Anstee在Leelananda De Silva帮助下编著的：《技术合作：执行卡塔赫纳承诺》，独立顾问提交贸发会议贸易理事会的报告，TD/40(2)/14，1994年3月4日。

- 由贸发理事会加强对技术合作的三年期指示性滚动计划的审议程序。这个办法能够提供一个有组织的场合供捐助国、受援国和秘书处就技术合作方案的提纲进行对话，最终拟定供秘书处执行的准则。
- 加强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和贸发理事会对技术合作年度报告的审议程序。最后应该就方案的总体状况、方案与经常性活动方案的关系和方案遵循后者优先次序的情况达成结论。随后的讨论可以评估讨论结果得到执行的程度。
- 加强对技术合作活动执行情况和影响的监测和评价程序。对个别项目执行情况的监测仍应由各自的项目干事负责；但是，对通盘项目执行情况的监测由中央计划和评估组负责进行。如上所述，目前正将以合理框架为基础的机制范围扩大，使其适用于技术合作活动，以便加强这个功能。持续进行评价也是中央计划和评估组的职责。但是，对主要方案进行专门的独立评价的做法应予保留并且加强。在每一个两年期内，至少应该进行两次这样的评价。这种评价的结果应该成为每年在工作组和理事会讨论技术合作的投入因素，并且应该形成具体建议以期增进技术合作方案的影响。

161. 总的来说，贸发九大的成果中所指明的优先次序还是有效的。技术合作应该在需求最殷切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最不发达国家应该具有优先地位。贸发会议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综合框架》和《国贸中心/贸发会议/世贸组织合办向若干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技术合作综合方案》的参与将继续得到加强。应该致力解决结构脆弱和经济部门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并应持续向经济正在转轨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如前所述，技术合作应该以需求为驱动力，并且着眼于进行能力建设。贸发会议已经确定的技术合作方案——包括咨询服务和业务活动，例如货物预报信息系统、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和外贸培训方案，都应该按照已经进行的评价所得出的建议继续执行。贸易点方案也将按照进行评价所得出的建议重新予以评估，并应提出关于如何开展今后工作的建议。上述各项方案之间的联系和有关各司的分析工作的加强都将得到加强。

B. 贸发会议和其他国际组织

162. 贸发会议成立以来，历来有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和协作的任务。据以在1964年成立贸发会议的大会第1995(XIX)号决议第18段中载述；理事会“应需要作成安排，取得工作与其职务有关之政府间机关之报告并与之建立联系。为避免重复起见，理事会应尽可能利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关提送之有关报告”。第19段中则载述：“理事会应与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建立密切之经常联系，并得与其他有关区域政府间机关建立此种联系”。

1. 协调：目标

163. 在各组织之间进行协调的目标是鼓励进行国际合作，以便使各成员国能够从不同组织各自的强项获益，每个组织都就遇到的问题贡献各自的专门知识和看法。但是，目前正对使用的手段展开广泛的讨论，作为传统作业方式的一些格局和做法受到了挑战。几乎整个系统的所有部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着变革。整个系统必须以较少的资源产生较多的成果。成员国越来越不以系统中个别部门的绩效、而是以整个系统的影响作为评判效能的依据。成员国将要求宗旨与行动的连贯性更加统一，并且要求从系统的集体努力中得出明确、具体的成果。

164. 从目前的政府间讨论和对改革的立场中产生的一个共同的主攻方向是认识到必须要求系统的各组织集中处理一些主要的专业领域，同时加强共同的合作行动。认为这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成本效益、利用各组织的互补性、并且确保整个系统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应付越来越多彼此相关因而需要全面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行政协调会历来大抵遵循这个工作方法，一方面重新明确划定系统中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则开展面向成果而且限期完成的具体联合行动。

165. 在机构间一级上，目前为加强方案互补性采取措施的同时，还需要重新查明作为主攻方向共同优先目标和优先主题、针对新需求拟订共同的处置办法、并且协调通盘的政策和战略。

2. 贸发会议和其他面向发展的组织： 与分工有关的问题

166. 贸发会议秘书处与面向发展的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许多联系。从形式上说，有的是在工作上进行业务联系，有的是拟订谅解备忘录和其他正式协定；从实质内容上说，有的光是交换资料 and 文件，有是则是合办项目。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行政协调会的组织成员、其他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商品、投资和贸易协会。¹²

167. 如上所述，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界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顾及比较优势、尽量采取综合行动、并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为此，正在具体地与各区域委员会和国际贸易中心进行讨论。对前者而言，自然的分工是由贸发会议处理全球性问题，而由各委员会比较详细地处理区域性问题。最近的一个事件是与欧洲经济委员会编写一份共同文件“俄罗斯的危机”，于 1998 年 10 月印发。就国贸中心的事例来说，讨论的重点是两个组织在向政府提供技术合作或在个别公司层级上执行技术合作的各自作用。将根据贸发十大规定的优先次序和核心领域进一步进行这种讨论和其他类似的讨论。

168. 国际社会承认了根据各种独特看法审查影响发展之问题的重要作法。在全球经济分析领域和其他方面，有必要维持独立思考，这是贸发会议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许多组织进行了这种分析，但每一个组织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言论自由将保障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因此，必须区别对待有几个组织做着同样的事情(例如收集统计资料)那种意味着重复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国际上就经济和发展问题交流不同看法的情况。

¹² 关于贸发会议同国际组织合作的全面资料载于 1998 年 6 月 5 日印发的第 UNCTAD/EDM/Misc.54 号文件，在关于 1998 年 10 月 22 日和 1999 年 5 月 28 日中期审查建议执行情况的说明(UNCTAD/ISS/Misc.239)中作了修订。

C. 贸发会议、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

169. 联合国体系越来越把由民间团体更加充分地参加其活动视为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因此，整个联合国系统都越来越多地明确表示愿意同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联合国秘书长于 1999 年认可了这种发展趋势。

170. 贸发会议历来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1994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联合国贸易效率问题国际讨论会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商界领袖们同各国政府代表直接讨论了旨在促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参加国际贸易的政策与行动。在这方面，秘书长在他为提交贸发九大于 1996 年初出版的报告中载述如下：

……可以作出决定，赞同能将各国政府正式达成的生产和消费协定付诸实践的一些个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参加经济问题的讨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眼光能变得足够深远，而开始容许私营部门和另一些人员参加我们日常的业务活动。

1. 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171. “促进增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第 118 段）授权贸发会议促使民间团体参加其活动“在非政府组织和贸发会议之间建立持久的发展伙伴关系”。(1998 年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发展伙伴首脑会议成功地吸引了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私营商业部门参加贸发会议的业务活动。该会议开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趁机要求私营部门将其诀窍、专门知识和资源用于共同谋求发展。但是，由于国际组织采取基本上不一样的着手方式而私营经济部门却是谋求利润的，也就引起了关于应该建立哪种伙伴关系的重要的问题。

172. 具体而言，有必要区分两种伙伴关系，前者指贸发会议及其伙伴的共同关注事项是进行和/或提倡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中的某些部门受益的研究活动，后者指共同执行最终产生明确终端产品的技术合作活动——无论这种产品是一套软件包、一个培训方案或政策咨询。在第一种情况下，伙伴为了改善它在公众中的形象，不妨购买广告宣扬它正与联合国共同进行研究。为了调和上述利益，可能需要修改关于使用联合国名称和徽章等问题的现有准则，但不致于在维护联合国诚信声誉方面引起克服不了的障碍。

173. 反之，第二类伙伴关系会引起利益冲突的困难问题。由于这类合作的潜在伙伴可能包括商业企业，除了上述问题以外，还会在选择某一伙伴而不选择另一伙伴、和可能涉及不公平之商业利益的相关问题上、遇到困难得多的问题。第二类伙伴关系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援方可能声称得到不正确的或产生误导作用的咨询意见或技术援助。

174. 上述问题并不是贸发会议的独特问题，而是整个联合国的共同问题。从来不曾对这些问题给予适当的处理，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没有一套首尾一致的明确准则。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领导下，目前正在拟订上述准则，贸发会议秘书长将参加这些工作。

2. 让民间团体参加贸发会议的辩论

175. 现在对民间团体有了足够的经验，已可考虑增进贸发会议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现有的结构联系。为此，可以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制度的定期论坛。可以采取召开特别会议的形式，使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同政府官员进行研讨。这种会议的目的是使贸发会议能够：

- 在涉及全球贸易、资金、知识和信息交流、技术及其与发展的联系等方面，丰富有关政策问题的辩论。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商业、资金和技术方面决策的官员和基层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将就实际生活中的宝贵经验和概念进行研讨。
- 针对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活动，得到源源不绝的反馈资料；
- 在拟订和执行与参加技术合作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新伙伴关系方面，确保采取透明的作业方式。

176. 每一个两年期至多召开一次的论坛会议应围绕着特定的专题展开讨论。选择专题的标准可以包括下列因素：与当前国际上的议题和贸发会议的工作有关、可能涉及具体行动、有可能与民间团体进一步协作。邀请谁参加会议将视该与会者能对专题作出多大贡献而定。关于会期、专题和与会者的决定将由贸发会议秘书长同成员国政府商定。讨论结果将由贸发会议秘书长向贸发理事会提出报告，有可能出版特刊予以传播。

177. 此外，秘书处同非政府组织与工会之间的年度协商将继续进行。

178. 可能考虑在另外两个方面加强民间团体对本组织工作的参与。其一、考虑到由非政府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参加贸发会议的专家会议。这一点似乎办得到，因为参加上述会议的人员是由政府提名、但以私人名义参加。可以拟定办法以容许民间团体的代表参加而不致改变会议的政府间性质。这项提议将回应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商业协会的关切，因为贸发会议同联合国另一些部门一样，通常并不充分鼓励和奖励它们参加政府间组织的会议。如果各国政府有此意愿，秘书处将寻找这样的机会。

179. 第二个构想是建议贸发会议以各地的“对话小组”建立分散的实际或虚拟的网络，而在国家一级上形成反馈机制。这些论坛将从国家和区域的观点讨论贸易和发展问题并于得出结论递交贸发会议审议。对话小组也可以成为对贸发会议技术合作的实施和后续行动取得反馈资料的渠道。

D. 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贸发会议：总结评论

180.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迅速的演变，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信：今后几十年内，世界经济还会发生迅速的变革。变革的方向历来难以精确逆料，但是，世界人民和各国或各地区将会更加密切地互相切磋的趋势无疑还会持续下去。

181. 私营企业的活动正在驱动着全球化的进程。私营企业活动全球范围延伸了，管理手段并没有在全球范围相应延伸。这种情况导致世界经济中有大片地区日益脆弱，从而日益动荡。全球利益的分配也随而日益不公平：穷国和穷国中的贫困阶层遇到日益边缘化的危险。

182. 目前迫切需要同时在全球和国家的层级上改善经济管理，发展目标必须是这种改进的主要内容。贸发会议将分担这项工作，应该进行调整，以便充分挖掘潜力。

183. 随着经济决策日益复杂，为了有效拟定政策，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的范围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为了解决它们的主要问题需要争取支持。从贸发会议自己经历过的三个实例看来，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需要掌握风险管理的现代技术以帮助他们应付商品价格的波动；他们必须学会评估贸易制度中拟议实行的变革可能对其利益产生哪些影响；他们也必须知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中哪些奏效、哪些不灵（和为什么失灵）。贸发会议必须从自己丰富的经验出发，必须在收集和传

递与发展政策有关的知识方面具备更加精进的能力。为此目的，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手段：政府间机构、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对话、和秘书处的活动。

184. 知识、信息和技术也日益成为私营企业建立和保持竞争力的基础。影响商业上有关知识之产生和传播的政策、机构和习例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地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整个发展进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机构和习例应该在往后的期间由贸发会议加以深入审查，以便查明促进发展的政策问题。

185. 增长和发展政策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特性对贸发会议来说，涉及两个重要问题。

186. 第一、知识有许多来源，流经许多渠道。参加社会活动的人员都是知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或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此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所引起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兴趣。让民间团体参加这个专题的讨论特别合适。

187. 第二、知识既是经济活动的支点，对公平的关注必然也成为对取得知识之机会的关注。人们历来关心获取资源之机会对公平的影响。但是知识即力量，要是不能取得知识，形成力量，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脱贫或缩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

188. 象贸发会议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机构的增值来源于凭借研究能力产生新思想的能力和从业务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对于发展问题的经验。贸发会议成立以来即锲而不舍地执行发展任务，的确由于它历来有能力担任研究、概念革新和政策分析中心、从而成为思想和政策倡议的创始者。

189. 贸发会议的任务是促使成员国进行富建设性的对话，并就国家政策和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发展的扶持环境提供政策指导，只有当贸发会议的研究成果和来自外地业务活动的经验教训能够帮助在成员国影响决策、拟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个人和机构的时候，这种任务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的有效和广泛传播对受权履行任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贸发会议为了做好这件工作，必须具有适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才能确实地把信息传给听众。

190. 作为一个发展机构，贸发会议必须在回应世界经济的演变时坚持履行任务。在今后数年内成为智力机构以后，贸发会议就能够更加切实地解决它历来对公平问题的关注，同时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发展的影响。

-- -- -- -- --